

# 炎黄春秋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

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省委文件出台记

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

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2003年

炎黄春秋杂志编辑部





## 目 录

### 求 实 篇

- 1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 ..... 李维民
- 8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 曾彦修
- 9 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省委文件出台记 ..... 李 原

- 14 刘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红旗 ..... 马成广

### 春 秋 笔

- 15 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 ..... 周瑞金
- 22 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 何 蜀
- 26 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 梁清强

### 英 杰 谱

- 29 隐蔽在阎锡山身边的中共党员赵宗复 ..... 王生甫

### 一 家 言

- 34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 李一鑫
- 40 谈谈“为尊者讳” ..... 迟泽厚
- 43 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 黄 瑶

### 人 物 志

- 46 宋教仁：不该遗忘的宪政精英 ..... 陈 章
- 48 兴衰荣辱“黄埔系” ..... 徐 平
- 51 殉职在抗日前线的诗人王礼锡 ..... 谢 琰
- 56 不负周恩来嘱托的传奇夫妇 ..... 杜 凌

### 怀 念 集

- 59 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 盛方仁
- 62 忆小高——《大公报》的高集 ..... 李 普
- 64 永久的青年——怀念李何 ..... 瞿独伊

### 文 荟 苑

- 68 《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 ..... 刘大明
- 70 华侨歌唱家黄源尹的坎坷人生 ..... 梅门造
- 74 邓子恢巧释“空城计” ..... 棲梧老人
- 61 王森然先生轶事二则 ..... 李郁秀

### 遗 闻 录

- 75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 孙闻浪
- 77 中英西藏战争百年祭 ..... 彭 苏

### 文 配 画

- 80 道与器——精神现象零拾之六 ..... 陈四益 文 丁聪 画

###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何 方  
范敬宜 钟沛璋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李 晨

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底先华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68522852 (办公室)

68534879 (编辑室)

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4.80元

#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

● 李维民

编者按：著名学者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在本刊第7期发表后，李维民同志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成文，对曾文提出意见，并将文章直接送给曾彦修同志，曾彦修同志阅后恳切地作了检讨。本刊将李维民同志文章和曾彦修同志检讨一并刊出。这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勇于纠错的胸怀，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1947年，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复查中大搞极左，全盘否定山东土改已取得的成绩，在所谓“搬石头”中，用“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等罪名强加于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大批干部被撤职、降职，大批专区、县、区、乡干部也遭到批判、撤职。这些干部被当作“石头”搬掉后，土改中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民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愈演愈烈。1947年底，中央提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后，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制止。但是山东大批干部遭到错误打击的冤假错案，拖了3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经中共中央同意予以平反。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虽然当时在中央和华东局的某些同志也有一定责任，但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东的康生，和时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起了最为恶劣的关键作用。

1947年我虽在山东渤海军区，但并不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在此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访问过当年被整的黎玉、林浩、景晓村、李震。文革期间李人凤

曾向我谈及此事，以后我又和他的夫人、曾任渤海区妇联主任的刘孟和景晓村的夫人王梦林多次深谈。特别是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高克亭，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主持复查黎玉、景晓村、林浩等错案及向中央写复议报告的情况。我还与负责调查和撰写《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报告的山东惠民地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邢天才和刁洪远、李晓黎多次交谈过。1994年我还找当年追随康生、饶漱石在渤海区积极整人，后来在文革中又大搞极左而闻名全国的王力，当面与他核对了若干事实。

## (一)

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是这样：1946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在延安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包括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不可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等内容。“五四指示”下达时，黎玉还在延安，饶漱石在东北未回来，在山东主持工作的陈毅，召集各区党委负责人传达

了“五四指示”，并且强调了要记取苏区土改时“左”倾错误的教训，不要形成“赤白对立”。7月，黎玉回到山东。8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黎玉、张云逸，要求山东加快土改进度，同时对土改政策作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孤立地主、稳定中农、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8月下旬，黎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东局土地会议讨论的情况，包括陈毅的意见，起草了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简称“九一指示”。接着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若干土改工作团，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据《中共山东地方史》记载：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余亩，加上原有土地，人均2.15亩，在土改比较彻底的地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当时国民党军正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敌情严重，新解放区党的基础不够巩固，农民的斗争觉悟还有待提高。在老解放区，存在着对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照顾过多及干部多分田现象。为此，山东各地党组织从1947年春天开始，在土改开展不够好的地区及广大新解放区，又开展了土地还家和土改复查。

1947年初，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也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指责山东的土改“右”了，有“富农路线倾向”，说黎玉根据“五四指示”起草的“九一指示”错了。并在2月21日以华东局名义发出的土改复查和春耕生产指示中，把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4月底和5月初，华东局又连发两个有关土改复查的文



林浩（左）、黎玉合影于1982年

件，虽然促进了土改复查的开展，同时也使“左”的倾向发展起来。6月下旬，华东局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以推行“富农路线”等罪名，对黎玉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新指示》，简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说“九一指示”有三个原则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这个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七七指示”发出后，使许多地方土改中已经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城镇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日益严重。

这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对于土改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中规定的平分土地的方法，很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同时对于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与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而对前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康生是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的五个常委之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在朱德、刘少奇、董必武之后位居第四），还是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此前他在晋绥搞土改时大搞极左，原来晋绥根据剥削行为定了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康生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在他驻点的村子乱打乱杀，还搞挖祖坟、追底财，弄得怨声载道。这种极左风潮波及到晋绥的许多地方，在中央土地会议上也有一定影响。华东局和山东各地区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数十人，有的人受康生、饶漱石极左思想影响，把山东土改中的问题说得很严重。

## （二）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决定借传达土地会议精神，首先向渤海区开刀。当时，山东解放区分三大片，即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中南（即鲁中、鲁南、滨海，以后合并为鲁中南区）。饶漱石从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反给黎玉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并把长期与黎玉一起工作，分别主持渤海区、胶东区工作的景晓村、林浩看成眼中钉，必



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拿渤海开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下半年,因为渤海区可能成为华东战略区的后方,华东局先派刘格平、王力(就是后来“文革”初期闻名全国的两位左派)去渤海了解情况。他们先到了禹城,这里距敌占区济南很近,是解放不久的新区。他们听县干部反映这一带敌人活动猖狂,杀了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王力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杀?”县干部说上面有规定,杀人要报批。刘格平和王力当即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又杀了40多人。到渤海区党委后,王力根据禹城、商河这些新区的情况以偏概全,写了一份指责渤海区锄奸反特不力的报告,叫景晓村发给饶漱石。景晓村看了感到其中反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劝他查实了再发。王力竟违反纪律,找了一个熟人,通过新华社渤海分社的电台发了出去。饶漱石把刘格平、王力和景晓村召到桓台县,专门听取王力的汇报,景晓村说明了一些情况,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不久,华东局派人到渤海区党委,宣布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给公安局长李震个人警告处分。同时决定把杀人权下放到县。从此,乱杀错杀之风逐渐在渤海区蔓延开来。王力因而得到饶漱石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的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王力自己说的,有人回忆,他并无总团长头衔,此前他不过是个科长)。

1947年10月8日到1948年2月25日,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会议开幕时景晓村还以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出席会议。没有几天,景晓村等就靠边站了,会议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实际上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特别是康生于11月6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场内外笼罩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因为康生是带着成见专门来整人的。

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于10月24日由中工委阜平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因渤海正在开会,……我接电后当即于

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者也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康生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

康生在电报中关于景晓村、李人凤、李震是这样写的:“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到党内来,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地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能彻底进行土改的”。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档案馆中。不必更多地引用他在各种场合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仅从这份电报和报告就足见其颠倒黑白、恶意诬陷,企图彻底否定和推翻渤海区党组织的狰狞嘴脸。

### (三)

景晓村在山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比康生出身的大地主家庭小得多了),如按划分阶级的标准,景晓村家应是富农。景晓村的父亲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当小学教员时就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抗战时期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并且在1942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景晓村出生于1917年,1933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这个学校出了大批共产党员,被称为山东党

的战斗堡垒。1935年景晓村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年他才20岁。1938年1月1日参与发动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委,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那年还不满27周岁的景晓村,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1945年,景晓村与司令员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沿线之敌展开进攻,连克25座县城,歼敌26000余人,解放了渤海区全部县城。杨国夫是长征前就任团长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和他小12岁的景晓村共事五六年,两人关系很好。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曾对我说过,他在东北听说景晓村在渤海被撤职,感到很不理解,对景晓村的遭遇非常同情。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罗荣桓传》时,看过景晓村抗战时期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因为他详细地记录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学习中央指示的体会及工作日记,足有数十万字。就是这样一位好学上进、勤奋正直、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被康生用“景(地主)”三个字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康生曾声色俱厉地指着景晓村说:“景晓村你一村不晓,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景晓村被撤职后,历经30多年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他当上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时已是年逾花甲。

康生说李人凤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李人凤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武装,首创在胶济铁路迎击日军的战绩。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团长,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曾在前线作战时负伤。他担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作出很多贡献。1947年,华东局、华东军区迁至渤海区后,40万部队和机关人员等,



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时的景晓村(1945年)

云集在这一并不富裕的地区。李人凤作为行署主任,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任务极其繁重。1947年6月18日,华东局在致“晓村并区党委诸同志”的信中,还说过:“对你们各方面工作之进展与成绩,表示欣慰。目前渤海担任着极端繁重的任务,对于整个华东战局的支持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康生参加渤海土地会议的第一天,《渤海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李人凤以行署主任名义发布的有关支前工作的一个训令。可是康生一到渤海,就给李人凤加上“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罪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渤海行署秘书长的马千里,愤愤不平地质问康生:“你说加重了群众负担,40万人在这里,不加重群众负担,吃什么,穿什么!”康生哪里听得进去。李人凤不仅在会上挨斗,而且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由康生拍板定案,1947年12月28日《渤海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自任职以来,不但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一再加重人民负担,庇护地主,维持封建势力,纵容匪特,镇压群众运动,……着即将该主任明令撤职。”《渤海日报》还专为李人凤撤职发了社论。李人凤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挨整,在1966年“文革”中又遭迫害。他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我曾去看望他,不久他便含冤去世。

渤海区公安局局长李震是最早挨整的,已受了警告处分,然而康生并未善罢甘休。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李震是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被俘的,之后恰有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我根据地内,飞行员被我军俘获。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敌人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我们联系,要用李震和被捕的临淄县长李铁峰换回那个飞行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的身世,觉得一个换两个对我们有利,经渤海区党委讨论



同意,把李震二人换了回来。他们回来后,经过山东分局严格审查,认为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发文件予以表扬。李震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著名的博兴暴动中担任博兴县后备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曾任东北军51军我党工委书记(解方任书记)。1941年从山东分局调到清河区党委任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离休前任铁道部副部长。他曾向我讲了他亲眼目睹的这样一件事:在渤海土地会议期



任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时的李人凤

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人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我们的干部。侵犯中农利益和没收工商业现象也很严重。如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其中不少是劳动人民。

#### (四)

康生另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挑动派性斗争。1947年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说:“军队与地方、冀鲁边与清河、外来与本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最后是山东干部与华东局干部之间,关系上不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他是挑动一部分干部斗争另一部分干部。例如,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时,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政委都是原清河区的干部,这是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工作时安排并经中央批准的,与清河区的干部无关。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有些反映,康生本应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可是他蓄意制造出一个以景晓村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把60多名干部列入这个集团的名单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原清河区的干部。康生在

渤海发现和利用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当时在三地委工作,“文革”时是山东造反派的头子,被选拔为山东省革委会第一任主任的王效禹。康生在批评景晓村搞“宗派主义”时就说过:“像王效禹这样的好干部,你为什么不用!”有些同志不同意康生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的做法。康生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说我们搞宗派,不错,我们是有一个派,是中央派,是毛泽东派!”会议大搞唯成分论,人人过关查三代,普遍改选了原先成立的各个支

部,由贫雇农出身的人组成新支部领导会议。如区党委机关支部,就由一个饲养员、一个炊事员等组成。振华中心县委妇联主任晓山对这种极左做法表示不同意见而被斗争。区公安局的于海东、韩洁石、韩华等被扣押审查。第一地委副书记曹戊,本人家庭没有问题,因为跟开药铺从医的舅舅生活过一段,就被批斗撤职。第四地委副书记刘鸿轩因不同意会上的一些做法,也被批判撤换。参加会议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区党委的科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十受到批判。第四地委被撤职、降职、调离的县以上干部有20人,其中包括一名地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一名副专员。土地会议所在的阳信县县委大换班,十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三个。至于县以下甚至包括村支部书记被当作“石头”搬掉的更是不计其数。

渤海土地会议召开后,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饶漱石在五莲县大茅庄主持了胶东区土地会议。和渤海土地会议一个调子,也是批判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都被撤销了职务。跟着康生去参加胶东土地会议的毛岸英,回到工作团后,曾对住同屋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林浩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见曾彦修回忆)。

鲁南、鲁中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的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间由饶漱石主持召开的。因为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

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

## (五)

康生、饶漱石正在山东大搞极左时,毛泽东根据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了注意防止左倾的问题。1947年11月下旬,他亲自修改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提出:“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在12月25日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持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左”的偏向问题。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接着又转发了习仲勋、邓小平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纠“左”的问题。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当前土改“主要是过左”。1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当前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观点。1月21日,刘少奇在致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之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必须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

面对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康生和饶漱石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山东土改的实际情况是自1947年华东局发出“七七指示”后,土改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在渤海、胶东、鲁中南土地会议前夕,“左”倾已成为主要倾向。可是,康生、饶漱石在这三个土地会议上仍大张旗鼓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一大批干部当作“石头”搬掉了。特别严重的是,党中央发出纠“左”的指示

后,他们不惜歪曲和抵制中央的指示。饶漱石把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坐镇渤海土地会议的康生,在中央指示下达后,继续残酷地打击迫害干部,李人凤被明令撤职的布告,就是在中央关于怎样划分阶级的两个文件发出后,于12月28日在报上发布的。

康生迟迟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纠“左”的指示,并向受打击的干部封锁消息。有一次景晓村问他:“我们在前段土改中是不是搞得‘左’了?”康生板着脸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由于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根据这一指控,不仅再次批斗了李震,还把各县公安局长等20人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李震对康生说:“有错误我们承担,不能把下面的同志都抓起来。”奸诈的康生竟故作惊讶地说:“有这回事吗?”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指出:“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如果康生、饶漱石稍有悔改之意,这时纠正他们大搞极左的错误还来得及。可是他们根本不思悔改,而且沿着极左的道路越走越远。为了彻底打倒景晓村,他们把半年前发生,早已处理过的赵寄舟事件,重新翻出来大做文章,制造舆论。赵寄舟是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据当时的报告说,1947年7月5日夜,赵声称去捉特务地下线,率领骑兵11人到了他姐姐(沈赵氏)和妹夫(沈平之)的村庄潍北县沈家营村。派警卫员小任去找村支书曹美枢,曹以为是敌特,就跑到民兵队部意欲号召武装自卫,小任赶至队部,曹即拿起铁锹与小任格斗,并将小任头部砍伤,随后赶来一骑兵开枪将曹击中,当即死亡。此事发生后,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处理,调查组认定赵寄舟是对其姐姐、妹夫(不是亲姐妹)被斗不满,回去镇压群众。于8月9日召开公祭曹美枢大会,当场将沈赵氏枪决“陪葬”,其他数人被判处十年、七年、三年等徒刑。赵寄舟也被开除党籍,撤职扣押



(后判徒刑)。以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报告、报道记载。近 20 年来,不断有人重新调查,呼吁为赵平反,我不了解实情,这里姑且不谈。

此事发生半年之后,1948 年 1 月 17 日,《渤海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刊出关于赵寄舟撤职查办的通令及社论等。第二天,又在头版刊载了 1947 年 8 月 9 日(即 4 个多月前)公祭村支书曹美枢的新闻、通讯、祭文。两天后,《渤海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全文刊出华东军区关于景晓村撤职的命令。内称:

“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有牢固的地主思想,平时领导上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毫不关心部属与基本群众的疾苦,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阻止与妨碍群众土地运动,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该员身为政治委员,不仅不保护土改的贯彻执行,反而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违反农民利益,阻碍土改运动,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此令”。“任命张晔为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任命刘格平为渤海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景晓村被撤销了区党委书记职务,张、刘继任区党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

上述命令是康生与饶漱石互相勾结,在中央已三令五申纠“左”的情况下,趁陈毅司令员去陕北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之机,未经中央批准自行炮制的。1949 年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他任命黎玉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景晓村任副秘书长。有一次,陈毅对景晓村说:“你那个老乡(指康生)是专门整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东省委经过认真复查,并经中央同意发出关于景晓村等申诉案件的复议报告([1984]9号文件),认定“渤海地区的土改不存在所谓富农路线的问题,也不存在‘坚持富农路线’的错误。”关于除奸反特“原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处分是不当的。以后在土地会议上又再次进行批判处理,更是不妥当的。”区党委“不存在‘宗派主义’和‘宗派集团’的问题”。“所谓景晓村包庇地主家庭与汉奸恶霸分子问题。……景晓村对其岳父无包庇行为。经查,景的岳父……未定汉奸恶霸分子。因



当年《渤海日报》上刊登的撤销景晓村、李人凤职务的公告

此,原结论为包庇地主、汉奸与事实不符。”康生给中央的电报说是“赵寄舟当场枪毙了支部书记。”复议报告认定是骑兵战士“误将”村支书打死。“从原材料看,景晓村同志对赵寄舟这一错误行动,事前完全不知道。结论说这是景晓村同志‘纵恣放任’,不符合事实。”“所谓李人凤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985 年 12 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中共中央于 1986 年 3 月批复,同意撤销 1948 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经中央同意发出的山东省委文件,推翻了康生、饶漱石强加在黎玉、林浩、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头上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沉冤 30 多年,这一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责任编辑 李 展)

#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 曾彦修

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土改团成员那时还在西柏坡,康是以钦差大臣身份驰赴山东解决问题的,而且他是从离西柏坡数百里的阜平县出发的,所以我们工作团员一点不知道。

大体上,李维民一文提出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员们到达渤海区之前,已经由康生一个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全部完成了。我们全体团员到渤海区阳信县比康生到达该区晚了三个月还多一点,是1948年春节前几天才到的。因此,我们对康生在我们抵达渤海区之前三个多月在山东的行动确实一无所知。

我现在郑重声明:我上面那几句话全说错了,并郑重向那个时期在山东被康生错误打击过的各级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希望他们接受我的道歉。

我的错误是:我没有看到康生1947年到1948年在山东整党过程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从而也就必然要引起在农村土改过程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而只片面地看到他在土改工作团内部一个时期的言论,从而说了大错特错的话。

对上述这点,我还要说明几句:土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就某一时期、某一小段来评其优劣,而必须就其

全过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土改的全过程,一般可分作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也即准备阶段——大体是在某年的秋收后到来年春播前,在北方习称冬闲时期。这一阶段,由中央局、分局或区党委召开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整党和土改政策的学习。事实上是着重在整党,即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一般都很激烈。不少地方是采取大动干戈的方法,对大量高中初级干部作大处分、大查办,从而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的。这样一来,土改中的“左”倾之火就被大燃特燃地点起来了。后阶段——进村后进行土改阶段,难免不按既定方针办。一个村的工作,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半年以上。但往往在该年冬闲以后,又要派工作队来“复查”或“补课”。有的一补再补,多半是越补越“左”。

李维民同志批评我的那几句话,确实是我讲错了。错在哪里呢?

第一,我没有把土改的前一阶段,即土改三级会议(主要是整党反右)那个决策阶段算在土改过程中。这当然完全错误了。因为没有这一阶段的“左”,就不会有进村后这一阶段的“左”。

第二,我把康生对我们土改团内部一个较长时期的态度,当成他的全盘工作来评论了,以偏概全,遂成大错。康生在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左”报告后,对我们工作团内部多次讲话时确是没有宣传“左”倾观点。但这是在学习任的报告以后一段时间。在这种时间和场合下,康怎么会再公开坚持他的一套极左观点呢?不可能的。因此,我那两句称康在山东土改中并未搞极左的话,确是说错了。在此,我向那个时期在山东工作的一切党内外同志表示歉意(有些非党员的区、乡、村干部照样被整得很厉害)。同时,我还向指出我这错误的李维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2003/7/18



## 云南

## 『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 省委文件出口记

● 李 原

1962年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中心和重点是研究农村工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参加会议，省委秘书长梁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腾波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参加。

会上反映，农村不少地方情况相当混乱，“反攻倒算”，“单干成风”，“自由市场泛滥”等等。还集中批判了“单干风”。要求今冬明春在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以刹住这股歪风。

会议期间，阎红彦和于一川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乱，恢复得比较快，生产是发展的势头；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阎红彦把云南的情况和他们的考虑向总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并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了解这个情况。

北戴河会议之后，于一川带领秘书长梁浩等先行回云南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9月13日至26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于一川传达了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联系云南情况进行了初步讨论。一致认为：云南农村形势是稳定的，继续好转的。内地农村的单干户不到农村人口的1%，“单干”没有成风，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群众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完全拥护“不搞政治运动”，而“以生产为中心，加强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的方针。认为这是符合云南实际，顺乎民心的。

阎红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9月底、10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实际是北戴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并把工作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加以肯定。整个会议联系一些政治问题集中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鉴于庐山会议以后的教训，毛泽东也特别嘱咐大家：“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都都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精神，更坚定了阎红彦、于一川和省委的思想认识以及对全省下一步工作的部署。

1962年10月25日至11月29日，云南省委在昆明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

神。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和军队团以上主要干部共793人参加。

11月26日,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代表省委作总结报告,着重分析了全省当前的形势,由此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全面部署了下一年的工作。

《报告》指出:经过两年多结合云南的实际,执行党中央政策的结果,巩固了过去的成绩,纠正了缺点、错误,基本上弥补了由于缺点、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目前,全省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工作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这个估计出发,云南省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应该是: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大力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市场状况,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简单地说,就是:“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

报告根据这个工作方针,全面部署了第二年的工作。

然后,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讲了“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根据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作了阐述。

《报告》联系实际,着重指出:云南省农村中没有刮起“单干风”,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同样存在的。“农民是一个动摇的阶级,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解决农民的动摇性,不是靠一个运动可以解决的。”“合作化以后搞过多次运动,并没有解决了农民的动摇性。”

结论是:根据这个理解,结合云南省情况,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这个时期突出表现的“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也就是说,经过调整,执行政策,发展生产,农村中是正常发展的状况。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结合对农民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达到巩固集体经济的目的。”(见省委转发的《总结报告》文件)

阎红彦在这次会上先后两次讲话,11月8日讲话,强调农村所有制调整,要敢于实事求是,不受干扰。11月28日,阎红彦在会议结束时也讲了话。

他着重讲了几个问题:

一、关于“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问题。

他说:“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具体地分析了云南省的情况,必然得出的结论。

二、全党要切实注意抓生产、抓分配问题。

他说:“无论从理论上说,或从实际上说,不从根本上解决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问题,就不能真正巩固集体经济”,“也就不能最后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说:“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他们才能满腔热情地来维护集体。”“如果不是年年增产,农民收入不增加,就不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民对集体经济就会产生动摇。”

三、加强党的工作。

他说:“执政的党,不加强教育,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互相监督,没有纪律,怎能保证不会变质?”“现在有的支部,连小组生活都没有民主,小组长都不能民主选举,这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说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打击报复,这是不能允许的。”

于一川的报告和阎红彦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特别是地、县委书记们的热烈欢迎。认为符合云南实际,思想提高了,方针明确了,任务具体了,工作好办了,积极性空前高涨。

12月10日,省委以(62)151号文件将于一川的《总结报告提纲》和《阎红彦的讲话》正式印发至公社党委。

会议总结了,“报告”也印发了,怎么又出来一个《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这样一个省委文件,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写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呢?

早在10月22日,西南局有个电话说:“从四川的经验看来,要划清阶级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透一点好。”于一川说:“四川那样提,情况不同,我们不那样提。”显然,这个话完全符合阎、于一川和省委商定的方针。

10月24日,于一川主持常委会,研究三级干部会议开法。

他在大会作总结报告时讲到:有的省,单干成风,自由市场泛滥,集体经济涣散,社会秩序混乱,不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那样一个政治运动,来改变那个局面。我们省的实际情况不同,因而,不应该,也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政治运动。而应该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加强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于一川在报告中为了加深干部的思想认识,采用了对比分析的办法,说明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其基本精神和总结报告是一致的。

《总结报告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印发时,为了避免误解,有意识地只保留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而回避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字句,其基本意思也同样表达了。

省委秘书长梁浩发现后提出:下边反映,省委明确讲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得人心。为什么正式印发的文件上没有了呢?是不是错了?因而产生“疑虑”。为了让大家放心、放手地积极贯彻省委确定的方针和工作部署,不要回避“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还是写明了好。

随即确定以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的方式,再正式印发一个省委文件。于是,由梁浩主持,省委宣传部长马文东、《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参加,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据马文东同志说,当时大家也曾担心加上那个话会有风险。但是苦思苦想,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词句;而且那

只是针对云南情况的一种做法,绝无其他意思。所以,最后在第7稿加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才送审定稿,上报下达的。

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更集中、更直接、更明快地反映了省委的基本指导思想。只是把“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改写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而完全没有料到竟犯了“大忌”。不管本意如何,形式上却被认为是“公然与毛主席唱对台戏”,“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有口难辩了。

西南局常务书记看到云南省委这个文件,立即抓住这句话。认为:既已明确打了招呼在先,你又针锋相对地写在省委文件上,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先在西南局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又亲自给云南省委的阎红彦、于一川打电话,要求查明情况作出交代。

阎红彦先是在电话上作了解释。接着,又听了参加西南局宣传会议的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回来向省委的汇报,传达了西南局这位领导人的批评指责。阎红彦听后大发脾气,说:“不说了,有责任我负。”“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



1966年2月,阎红彦(右)在云南农村考察

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我就天天搞运动！”

为了缓解这个困难局面，马文东等几个人商量，想以起草人的名义向西南局写个检查，承担责任，以解脱省委的压力。阎红彦不同意，他说：“这不行，你们哪有这个胆量？这是省委的意见，责任在我。”当时，阎红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接近年底了，阎红彦把马文东叫去说：关于批转《意见》的省委文件一事，睡不好觉啊。这个问题老顶着也不好。我一个人倒了不要紧，不能把省委的其他同志都牵连进去。我考虑以个人名义给西南局常务书记写封信，对《意见》一事作些解释说明。

马文东根据阎红彦要讲的意思，执笔把信写好，阎红彦略作修改后让马上发出。时间注明是12月29日。随后，阎又颇有感慨地说了一句：“想为群众办点好事，真难啊！”

这封信的内容摘要如下：一是“这个文件确实写的非常不好”，特别是“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那样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是错误的。西南局指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二是起草这个文件的“根据之一”是会上干部思想反映。原来的用意是，为了避免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受到干扰”，以为这样提法只是讲我们的做法，“更明确一些”，“放得更稳一些”，“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三是就我来说，对于这样一个指示性的文件，“处理上是马虎”的。文件印发各常委审阅时，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也“没有集体讨论”。会议结束后，忙于下乡，“也再没有认真的研究一下”，就用省委的名义批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四是我这次下去跑了几个县，“情况还好”，“干部群众的情绪很高”，“生产秩序是很好的”，“结合安排生产，执行各项政策，对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各地都还抓得比较认真”，“市场情况也比较好”，“国家收购任务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整个形势是好的”，“云南今年是一个相当好的年景”，“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动员各方力量，鼓一把劲，争取明年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阎红彦这一段工作如常，但心情一直是不好的。

1963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杭州会议。云南没有人参加会议。李井泉告诉阎红彦：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云南的问题，指名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听了，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最初，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看了云南省委的文件后，没说什么。因为他了解云南的情况和做法，也知道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只是公然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写在省委文件上，无论如何是不妥的。后来闹得沸沸扬扬，他几次说话，替云南“打圆场”，但平息不了。特别是毛泽东点名批评之后，他便告诉阎红彦：需要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

此时的阎红彦进退两难。说根本错了，他思想不通，不愿意违心地去说假话。但把那个话公然写在省委文件上，“确也有嘴难辩”。组织上要求检讨又不能抗拒，还怕自己在会上说话不冷静，更不利。再加上这一段时间，他身体确实不好，高血压、心脏病也波动较大，医生要他去外地检查治疗。所以商定，家里工作，就请于一川主持，并代表省委完成检查任务。商定的检查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根据云南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的，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但在文件处理上确有错误，反映了我们对主席教导，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应该记取深刻教训。他安排好之后，就去外地检查、治病了。

5月21日至27日，云南省委常委陆续召开7次会议，着重就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严厉批评进行检查。总的承认，“文件处理有错误”，说明“对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缺乏深刻认识”。

5月10日至23日，西南局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于一川作为西南局委员出席会议，并正式代表云南省委就此问题作了检查。

5月28日，于一川又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报告。

5月29日，彭真专门来云南检查工作，并受中央委托处理此事。

彭真到后，先看了省委送的汇报材料，又亲自作了考察。



5月31日,由于一川主持,省委正式向彭真汇报。着重讲了云南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所抓的各项工作,当前全省总的形势和省委的主导思想。还专门说明了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那个文件的用意和对错误的认识。

彭真在听取汇报中有不少插话,录其要者,可了解其基本精神:

当汇报到省委对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时,彭真说:“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

当汇报到省委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本质认识不够时,彭真说:“我看了你的报告(指于一川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一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

“你们不是有另一个方向的问题,而是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深些浅些,抓得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

当汇报到宣传部文件的错误,主要由省委负责时,彭真说:“大家是一个范畴的问题,被蛇咬了,看见绳子也怕。”

当汇报到扭在具体政策界限上省委未下决心铺开时,彭真说:“现在就是要全面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搞一次阶级斗争。”“基础是群众斗争,不然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你们省委这些人,去摸了,就晓得了。因此,还是个认识问题。”

彭真听了汇报认为,云南省委是结合云南实际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精神 and 中央指示的。还是抓了阶级斗争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整个云南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主要是对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大深远意义认识不够,要加强学习。最后肯定地说:“好了,你们的问题清楚了,解决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汇报。”

彭真还在6月初召开的云南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首先肯定云南的工作和好形势。着重阐述了毛主席讲阶级、阶级斗争的深远意义,以及据以抓好城市“三反”、农村“四清”的重要性。

云南省委于6月2日到19日,召开了有省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地、市委书记80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和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了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精神。学习了彭真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检查了云南省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一川代表省委作了检查报告和发言。会议根据西南局的部署,讨论了在全省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具体工作部署,并于6月25日把会议情况向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

在这之前,《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检查报告》也于6月20日报送西南局、中央、主席。

西南局于6月28日批复:“西南局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望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下定决心,把这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搞深搞透。”

至此,一场历时将近一年的、惊动颇为不小的政治风浪,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了结。但是,它对人们思想的触动和对形势发展的影响,远没有结束。

云南省委领导层经过这场斗争和反复思考,认为这次问题的妥善解决,还是“实事求是的胜利”,深深感到:“实事求是”不简单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关系事业成败的重大课题。也有的人感到:如何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做起来是难而又难。有的人则更加谨小慎微,多考虑如何不犯错误了。

省委只是在省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地、市委书记80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了这一事件的情况,学习了彭真的讲话,并给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照省委安排抓紧做好,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注意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县以下就没有传达这一事件的情况。事实上,广大干部还是知道了这次激烈的斗争,尽管不是那么全面和深刻,也引起了思想上不小的动荡和混乱。有的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压力更大了,凡事都要注意提到“纲”上认识和处理,引起各方面关系越来越紧张;有的人对省委的指示和决定,哪怕是明确写在文件上的,哪怕是明知对的和好的,执行起来也增加了迟迟疑疑,左顾右盼。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工作的顺利发展。(责任编辑 李晨)

## 是润烟池，不是水牢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在庄园的廊房里，布展着闻名全国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艺术再现了残酷剥削当地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我向讲解员问起“水牢”的事，讲解员带我们走到一处像仓库的地方。她说，这儿就是当年被宣传为“水牢”的地方。实际上不是“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只是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 狱中绣红旗者是罗广斌不是江姐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部反映解放前夕被关

# 刘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红旗

● 马成广

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同国民党警察特务进行斗争的纪实小说《红岩》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接着，戏剧、电影接踵而来。江姐（江竹筠）、许云峰、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革命者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高大地树立起来。特别是江姐，她不是个艺术虚构的形象，完全是真有其人。在反映江姐的作品中，尤以她狱中绣红旗的一个情节最为生动细致，也最感人。不久前我去重庆旅游，重访渣滓洞和红岩魂纪念馆，却从布展的史料中意外地发现，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而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及其难友。讲解员指着那件绣得不怎么规整的红旗原件解释说，重庆临近解放时，都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了，罗广斌向难友们倡议，绣一面五星红旗迎接解放。于是，他把自己的红被面撕开，几个人偷偷地绣成了这面旗子。那时，他们还不知旗子上的五星怎么摆，所以才绣成这个样子。虽然在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但江姐在人狱前和人狱后的表现，都充分说明她无愧是女中英豪，是一朵雪中红梅。

既然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那么，这件事又怎么扯到她身上去了呢？这还要从《红岩》产生的那个年代说起。那时，一些文艺工作者搞文艺创作有一种误区，即树立的英雄形象必须是“高、大、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好得完美无缺；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坏事做绝。他们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也混同了真人真史同小说创作的根本区别，就连《红岩》作者罗广斌本人也未能逃脱这种误区。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把罗广斌的事迹生拉硬扯到江竹筠身上，以致谬史流传。事实上，只要是以真人真事写作的任何作品，在史实上是不能杜撰，不能张冠李戴，不能胡编乱造的。还是讲解员说得好：“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告诉参观者真实的历史。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那么惨烈，任何一点的胡编乱造都会造成后世人对整个这段历史的信任危机，而这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责任编辑 仲文）

# 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

## ——癸未羊年答《新民周刊》记者问

● 周瑞金

12年一个轮回。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的《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署名评论的开笔句子。如同后来出版的《交锋》一书中所言：文章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紧接着，同一署名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陆续见报。四篇文章，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

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选用改革开放人才，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评论文章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精神。

作者“皇甫平”这才引起海内外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

**“皇”乃“奉”，“甫”为“辅”，此“平”原非彼“评”**

记者：周老师，癸未羊年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十六大的主要精神将引领我们奔向全面小康社会。回顾1991年皇甫平评论，对于今天中国的深



周瑞金

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有启示的作用。大家关心，你们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笔名呢？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

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记者：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一些媒体有许多猜测，准确吗？

周瑞金：一般不太准确。其实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 中国改革面临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皇甫平”应运而生了

记者:开篇没有引起太多读者注意,后来却酿成大张挞伐的“皇甫平事件”,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素?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

国内有些人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记者:我注意到前几天媒体上的一篇文章,中央党

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在回答《北京日报》记者访问时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处于不断解放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他说: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当时的论调尖锐到不是讨论中国会不会演变的问题,而是讨论到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后,上报中央的会议纪要认为,提“一个中心”是不对的,应该提“两个中心”。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把政治中心置于何处?政治中心就是应该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王教授这番话也可视作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周瑞金:就是那个“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矛头是直指刚上调国务院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当时的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的八大路线变化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不久,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接着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记者：周老师，你是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于你肯定是记忆深刻。尤其是“文革”，更让你有切肤之痛。

周瑞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当作“修正主义接班人”遭大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给人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破坏，我有切身的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真心体会到精神的解放，深感我党不能再搞害人害国的那套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党能发给他一块“免斗牌”。这句内心出血的沉痛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所以我觉得，中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再产生反复，我们再也付不起这个历史反复的代价了。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六四风波”中学生提了许多口号，却没有一条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使用的“僵滞”一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僵化这个词，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用过。毛泽东曾经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僵化，讲得重了。当时对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因此笼而统之地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参观深圳先科激光公司

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记者：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里引用了很精彩的古人文字，那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大略》中说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周瑞金：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这段话的。我们在文章中展开了阐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

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我们议了下面几层意思:一、就国家基本制度而言,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存在“姓社姓资”之争;二、作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是很正常的事,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为我所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姓社不姓资;三、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说,过去长期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并非社会主义,需要加以改革,而过去长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四、在改革开放中允许探索创新,不能以不正确的“姓社姓资”的定性来指责别人,阻碍开拓前进。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只好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记者:就发表的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有文章评述,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

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只有少数几个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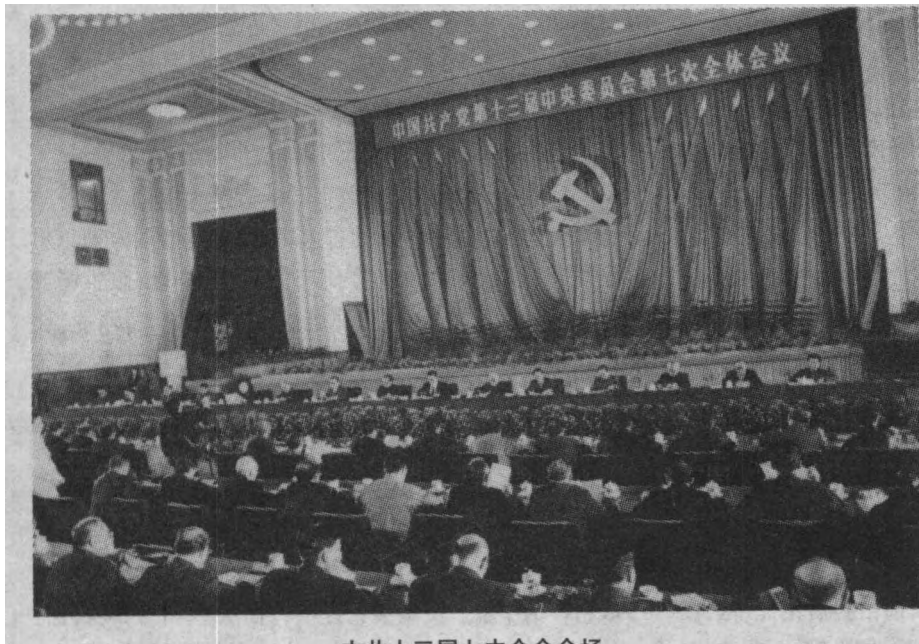
## 难忘 1991: 一个要不要改革开放的激烈交锋年

记者:你们期望 1991 年是改革年。然而,却成为改革的交锋年。

周瑞金:有交锋好啊! 1991 年 4 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八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

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



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会场

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记者：好家伙，他们打上门来了。

周瑞金：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动。于是，市委领导交待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作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待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这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记者：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

周瑞金：他就吃亏在这上面，后来灰溜溜地离开了报社。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哩！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十月份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

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记者：这不是用生动的比喻，批评凡事要先问一问“姓社姓资”吗？这个交锋有智慧，够水平！那当时，你们有没有要写文章参加交锋的想法？

周瑞金：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

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 不转载《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一文,表明对批判“皇甫平”的态度

记者:今天回顾起来,当年的交锋还真有点惊心动魄哩!

周瑞金: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坚持真理的坚定性。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是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说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转载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可以说,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我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记者:听说,你们在1991年下半年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周瑞金:是这样的。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就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决不能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只求无过,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这年十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鲜明提出只有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才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才能为防止“和平演变”奠定更加坚实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资料中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集中请了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如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人,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

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地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 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确定了党的十四大方向

记者: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周瑞金:是呀!小平同志就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



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进行南巡,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并用“发展是硬道理”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经济迅速搞上去。他尖锐提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所以,他得出结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记者: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皇甫平”文章的论争,是中国处在一个历史关键关头要不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之争,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之争啊!

周瑞金: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级报,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同“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我们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侧重于阐述新的重要思想观点。1992年4月发表的《论走向市场》着重论述了小平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解决了一些干部群众存在的“加速发展会导致经济过热”的疑虑。接着,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小平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衡量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一年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上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撰写了《论“换脑筋”》的评论,根据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提出的重要观点,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观念,这场深刻变革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重大改变,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性关键性问题来“换脑筋”。

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很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知名大报转载。这表明,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速度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换脑筋是必经之路。

## 我心依旧,为开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记者:在1992年6月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获得一等奖。这是对皇甫平文章的肯定,也是对你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勇气的褒扬。

周瑞金:(淡淡一句)不同的意见总还是有的。

12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经成为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今天,时代前进了好多,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异彩纷呈,举世瞩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写上十六大的党章,成为我们党的长期指导思想。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有新思想指引,有新班子领导,有新目标奋斗,前头充满新活力、新创造、新希望。我们真应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奔小康!

在癸未羊年回首辛未羊年,如果说有什么感触的话,集中到一点,就是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世界变化太多太快,中华民族复兴任务太重太大,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使自己的观念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实践的发展,不受过时的条条框框所禁锢。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敢为天下先,不怕冒风险,去探索,去创新。

我心依旧。作为在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位老兵,我始终认为,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我愿同广大宣传思想工作一起,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2003年2月 上海  
(责任编辑 杜晋)

# 为民请命的 “萧李廖反党事件”

● 何蜀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1962年6月28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

“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3时到6时半。”（见该书第190页）

后世读者很难想到，这一简短的记载背后，有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

原来，这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谈话，谈的是四川农村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和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应负的责任。这是重庆市一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实下情的一次“为民请命”行动。

关于四川当年那次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比如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前将彭德怀“意见书”发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进行测试，根据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即挨户搜查粮食），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到了省里谈

为“今年农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1962年春，全省农村人口人日平均口粮不足六两（十六进制），据统计材料，涪陵、万县、江津在五两以下。因而人口连续四年呈负增长状态。1961年负增长为57.9%（全文见《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1—10页）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见该书1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见该书194页）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那次谈话。遗憾的是，那次谈话之后不久，包括“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在内的重庆市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就被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加上“反党活动”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是当时在全川引起极大震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痛加批判的所谓“萧、李、廖反党事件”。

这个“萧、李、廖反党事件”主要涉及些什么人呢？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向杨尚昆汇报情况的“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一个就是廖伯康，另一个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于克书。这几个人中，“萧、李、廖”都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工作过的地下党员，萧泽宽曾任最后一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李止舟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廖伯康当年也是地下党员。于克书则无四川地下党的渊源，属于“南下干部”。

尽管在此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已经将大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干部打下去，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自然更会前赴后继地不断涌现。

## 二

萧、李、廖及于克书等人，对当时农村现实都有清醒的了解。他们大多参加了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整风整社工作团”，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于克书是巴县团副团长，廖伯康则坐镇市委办公厅，对各地的报告、简报有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最初他们还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有问题，也按照上边的部署，以“阶级斗争”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层干部，开大会斗争。但后来逐渐发现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但省里主要领导人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荣经县死了一半的人，省委主要领

导人就怪罪当地领导，下令把县委书记抓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以发扬民主著称的“七千人大会”。萧泽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各地干部对中央领导部门的直言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出气”），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态度，使他深受鼓舞。

1962年2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对工业上整重庆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安以文，农业上整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这两大冤案意见最大。重庆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给重钢安以文平反。各部门干部对省委意见不仅提得多，而且很尖锐。重庆市副市长邓垦批评省里犯了几年左，却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干部不敢说真话……后来这些都成了萧、李、廖“煽动反对省委”、“刮起一股反党歪风”的“罪行”。

重庆会还没开完，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就召开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定下调子：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完全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



李止舟（左）、廖伯康（中）、萧泽宽平反后合影

任的气度。同时,按照中央规定应该上报的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简报(主要是对省里领导人提的批评意见),也被扣压了。

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后不久,主持共青团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的于克书在大家鼓动下,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团市委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谈到四川死那么多人中央知不知道?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于克书就提出是不是写信反映。团市委的几个副书记都提议他来写。不过他并未马上就写,直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省委工作会议后,他们得知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上广大干部对省委提的意见未能反映给中央,被省委领导人压下来了。于克书才下决心上书中央告状。因为他们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人报复心强,整人厉害,他会动用专政手段搞邮检、查笔迹,便没有署真名,而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了“匿名信”,为避免被查出笔迹,是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为避免被查出邮寄地点,还专门托出差的人将信带到武汉去投寄。

于克书上书,还有一个背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写于1930年春的文章《关于调查研究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为此,胡耀邦给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信,强调要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要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要调查研究。在这背景下,团委下去调查研究,向市委反映了很多情况和社会问题,大约1962年4月,团中央开座谈会,大城市的团委书记或部长参加,团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有什么框框限制。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作为中央委员,于克书作为候补中央

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是他们的老朋友,听他们说起四川的严峻情况,立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单独谈话。随后把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这才有了杨尚昆代表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的事。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领导人闻知,当时还以另外的借口给廖、于二人向团中央全会请了假。廖伯康事后感慨: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这样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次谈话中,杨尚昆首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不是找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找你们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又说,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有逃荒到陕西凤州的人写了《一字一泪诉川情》给国务院办公厅,转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后也很震惊。他们还收到另一封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也写得很好(杨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面前的于克书所写)。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廖伯康和于克书还反映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强调四川特殊,许多中央文件得不到贯彻执行,独断专行,主观臆断,瞎指挥,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等。后来廖伯康说,他们为这三个多小时的汇报,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厉害。

杨尚昆听汇报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干部到四川调查。为避免引起四川领导人注意,特地从中央一些部委选派了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十多人,以回乡探亲访友名义分别赴川“微服私访”。只有萧风(原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这时已调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不是川籍干部,因他参加过调查安徽同类问题,有经验,也获准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调查。

调查中,四川地方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将四川主要领导人调离,邓垦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另调胡耀邦来四川主政。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



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因此,萧、李、廖等人都认为,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于克书的“匿名信”也被批发给中央领导人传阅,为了不让四川主要领导人看到后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杨尚昆特地让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只批发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但此事仍被四川主要领导人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级看到后转告了他),预料中的追查和打击报复不久就开始了。

### 三

1962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与七千人大会时相比,风向转了。1963年春节后,四川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接着,4月23日至5月8日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按照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旨意整“萧、李、廖”等人,于克书写信的事也被一位曾经建议和鼓励他上书中央的同事揭发出来。萧、李、廖等人遭到多次大小会议批斗。他们先是被停职反省,然后处分,萧泽宽被免去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职务,调到农村搞“四清”;李止舟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第二砖瓦厂当副厂长;廖伯康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建筑工地当工人;团市委副书记王竹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下放基层;于克书、赵济(团市委副书记,李止舟夫人)免除职务,降职另调工作。重庆团市委五个书记撤换了四个。本来副市长邓垦也要被定为这个“反党”事件中的首犯,但因碍于邓小平与邓垦的兄弟关系而没把他划进去。后来邓垦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了,向邓小平提出,通过组织调到了武汉。

得知四川处理“萧、李、廖”,杨尚昆和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长)分别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再追了,明确说对四川灾情的调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四川主要领导人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认定“萧、李、廖”等人是在四川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

表。现在是“左派”反击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四川主要领导人将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后贬至四川先后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绵阳地委副书记的张黎群抛出来作为“黑帮”狠加批判,按照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重庆日报》6月13日发表了题为《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剜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文章,在批判《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专栏时,公开点名批判重庆市“萧、李、廖反党黑帮”,说“《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不是张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谋划策,合伙经营的。廖伯康等人到处煽风点火,攻击三面红旗,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文章号召“市级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昂扬斗志,穷追猛打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遭处理多年的“萧、李、廖”,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直到1966年底群众性造反风暴掀起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们并非为了社会公正而支持群众造反。在1968年3月15日的讲话中,“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

近年来,已经先后离休的萧、李、廖等人都用了许多时间对那段历史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他们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党史工作者的帮助下,他们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已经写成,正待出版。

(责任编辑 李晨)

# 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 梁清强

刚刚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然而在此之前,世界日新月异进步的时代,中国却曾经历过长达 20 年的停滞。生产力长期停滞,显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因而阻碍了它的发展。长期停滞的 20 年,恰恰是中国大张旗鼓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我们所反的并非修正主义,而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促进中国迅猛发展的指导方针,这方针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这似乎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文革反修”论看来还很有市场,邓小平理论还或明或暗地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文革”理论所指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所攻击的对象究竟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这个名词,首先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列宁在此文中还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泽东最早反对的“修正主义”是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秘密报告”。其实这份报告不过是就事论事,论事的原则仍然是马、列的嘱咐和教导,并未作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难道会赞同个人崇拜和滥杀无辜吗?当然不会。所以,以此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理由不能成

立。后来“修正主义”的帽子延伸到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只不过是搞了“工人委员会”等民主新形式,强调自己国家和党的独立自主,直率地批判斯大林,而并没有“修正”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62 年秋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给实事求是指出“大跃进”中一些错误的彭德怀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5 年 1 月,在党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产生分歧。后来刘少奇让步了,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然而毛泽东还是当着刘少奇的面指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 年 9—10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0 月 10 日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由此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认定中央已形成一个与他势不两立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仍然只有赫鲁晓夫、铁托、彭德怀及刘少奇等一些被看成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修正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述。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所谓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不是越来越清楚,反而越来越糊涂了。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

“经验主义”一语,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未作正规的解释。1959年8月,“反右倾”斗争开始之际,根据毛泽东指示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亲自为此书作序推荐。毛泽东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中,并无“经验主义”条目;只有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的“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论”等条目。查看内容便知,这些条目与毛泽东所说的“经验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西方和苏联哲学中所说的“经验”都是哲学范畴的“经验”,而毛泽东所说“经验主义”中的“经验”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丰富”的经验,准确地说,这“经验”指的是“经历”,并非哲学意义的“经验”。例如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这里所说的“经验”显然就是指个人经历,并非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经验”一词的概念。毛泽东所批的“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指名,但很明显是指一批老革命家。1973年,又再次大量重印了这本书,广泛发给党、政、军和企业人员学习批判。显然,这“经验主义”是对周恩来1959年在庐山会议前期的态度和1972年批极“左”的直接回应。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约见张春桥、王洪文时,指责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谁都明白,这话是针对周恩来说的。江青所以热心批判“经验主义,”其矛头所向也是周恩来。

其实,这种“经验”并不成为“主义”,“主义”应当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

哲学。外国哲学辞典中也没有这个条目。所以“经验主义”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属于修正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而且恰恰相反,周恩来等一批老革命家的经验,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从来被视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宝贵财富。

教条主义在中国和外国历史上都曾有过。他们历来固守革命导师的著作和指示,反对任何对革命导师言论的改动。他们与修正主义是对立的,把教条主义划入修正主义显然牛头不对马嘴。

更为奇怪的是,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有“修正主义”了。1975年秋天,毛泽东发表了他评论《水浒》的谈话,其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时还加以错误的理解,比如马、恩最重要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里面说:“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但毛泽东却把无产阶级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他认为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了。例如他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由此可见,他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构成当代先进生产力,亲身经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毛泽东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与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一样,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概念的使用也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就是“四人帮”杜撰的。历史唯物论认定生产力属第一性,生产关系为第二性,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可称为唯生产力论。“文革”理论提倡的实际上是“唯生产关系论”,纯属唯

心主义历史观。在这里,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楚吗?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们那自成一派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文革”理论在许多基本观点上与俄国民粹派有共同语言。比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幻想在农民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资产阶级特别仇恨,不承认他们曾经推动历史进步而且给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迷信英雄创造历史,宣扬个人崇拜等等。正如列宁所说:“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4页)

终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理论家胡绳生前曾以高度原则性、责任感和极大的勇气,严肃指出建国后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倾向。胡绳同志曾因此而受到围攻;但围攻者终究未能推翻胡绳的论断,因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无法否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派属修正主义行列。既然晚年毛泽东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文革”理论与修正主义自然不会有太远的距离。

列宁早就说过,修正主义有“来自右面的”和“来自左面的”两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我们听得很多了;“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则很少听到。不过毛泽东自己也曾经把“大跃进”中的“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1959年春天,毛泽东的头脑曾一度冷静,3月5日,他批评1958年“大跃进”中:“拦路抢劫,不作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当时的“共产风”尽管严重而且普遍,但在理论上还不成系统,构不成一种“主义”。然而毛泽东使用了“向‘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语倒是挺有意思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思潮就大成气候,并且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其中所谓的“修正主义”包罗更广,无法成系

统,难以自圆其说,恐怕称之为“修正主义形态的极‘左’理论”才名符其实。

中国的极“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很明显,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不断的斗争和运动,对于“产品极大地丰富”的社会主义富裕目标不想去争取,而且很害怕。

“文革反修”论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吓唬人家说:“‘文革反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定论,谁也翻不了案。”然而我们查看一下当年那份公报,原文是这样写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公报”中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仍持慎重态度,还说它是“一场大革命,”并未全盘否定。因此说“从反修防修出发”显然属于权宜之计的用语。而且这里的“出发”一词只是指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公报并没有从客观上肯定它起到“反修防修”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再也没有“文革”动机是“反修防修”之类的说法,而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很清楚,“文革反修”论绝对不是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隐蔽在阎锡山身边的 中共党员赵宗复

● 王生甫

从抗日战争前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在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有一位中共党员长期隐蔽在阎锡山身边，巧妙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赵宗复。

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赵戴文曾留学日本，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赵戴文历任山西省督军公署参谋长、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他与阎锡山朝野相处38年之久，私交甚笃。但他在政治上坚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

正是有了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赵宗复1933年12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共产党以后，便开始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从事隐蔽的革命斗争。

## 潜伏敌区为党搜集情报

1932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对外称第三国际东方部），急需一些和国民党政府上层有关系的同志到该组织工作。由于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于是便由中共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和北平“社联”研究部执行委员李正文二人将赵宗复推荐给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柳忆遥，参与情报工作。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的关系，搞到了不少国民党亲日派和日军勾结的情报，他还介绍另一个有上层关系的党员赵中枢到第三国际东方部工作。赵中枢是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的儿子。他们两人合作，积极搜集情报。1933年初，他们从绥远省政府搞到了一份从内蒙到新疆的路线、地形、地貌的考察报告，为苏联红军在日军侵犯蒙疆时进入内蒙行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信息。1937年5月，正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前夕，赵宗复、赵中枢等又从北平、天津和日本国内，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设施，以及日本国内海军舰队组成情况、各军舰的名称、排水量、高射炮时速和口径以及日军运输能力等重要资料，及时经过“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和有关部门。

## 推进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宗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赵中枢一起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工作。这是一个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山西、绥远、察哈尔三个省政府以及各抗日团体共同派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战动总会”主任系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方面的代表是梁化之、王尊元、蒋右丞。赵宗复到“战动总会”后,先是做代理宣传部长,后又到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以便深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及时了解阎锡山等高级军政人员的政治动态,巩固扩大我党和二战区的统一战线。

1938年初,由于日军的占领,山西被分割成无数块互不衔接的小块,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之间,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之间,二战区总部与各军之间,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对统一步骤、协调作战诸多不便。在赵宗复建议下,1938年3月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了政治交通课(后改为政治交通局),由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具体负责组建,任命赵宗复、赵中枢为正、副局长。

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搜集日伪情报等。交通局为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样一个进步组织,却被阎锡山旧军所敌视,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政治交通局“通叛”为借口,于1939年12月命其下属将驻扎在山西隰县冯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围在一个大院内,声称要缴械,并抓走了隐蔽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梁维书、阴勿斋等7人。当时赵宗复挺身而出,堵在大门口大声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主席(山西政府主席赵戴文)的指示,在这里驻扎的。谁胆敢再闯进院内闹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他并对带兵前来的团长说:“国难当头,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干那些亲者痛,仇者快,对不起国家和家乡父老的事。”随即电告其父赵戴文,汇报政治交通局被包围情况,赵戴文出面干预才解了围。赵宗复脱险后,立即向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作了汇报。王指示赵宗复派人继续与第三国际情报组织联系;把没有暴露中共

党员和情报工作身份的赵宗复、赵中枢、阴勿斋、萧希明、梁维书继续留在二战区搞情报工作,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通过王世英联系;把已经暴露身份的30名青年干部,分两批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这件事触怒了阎锡山,阎事后派其亲信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并给予赵宗复“撤职查办”的处分。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仅以“年轻人作事荒唐”为由,撤销了他的职务,而没有“查办”。这样,赵宗复、赵中枢等人,只好转到别的岗位上继续战斗。

## 打入要害部门发挥更大作用

1940年后,阎锡山防共、反共的措施更加严密,要想取得重要情报,就得参加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为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指示赵宗复说:“要尽最大努力,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打打得越深越好。”根据上级指示,赵宗复1940年5月加入了国民党,并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了培训。返晋后,他又打入了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成了这个“同志会”的“基干”和“干委”。同年12月,他又多了一个山西省政府参事的头衔。赵宗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配合我党另一系统的地下党员杜任之,一起给阎锡山施加影响,坚决反对阎与日“和谈”,并及时将阎锡山的动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来自赵宗复的报告极为重视,多次作过重要批示。在此期间,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曾多次出面直接阻止阎锡山降日,对阎施加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多次对阎锡山提出警告,终于迫使阎锡山没敢公开降日,没有成为汪精卫第二。

赵宗复进入阎锡山领导层活动之后,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全力搭救我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免遭反动势力杀害。

与赵宗复并肩战斗的杜任之,是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省政府委员、民族革命同志会候补高干”。1942年9月,在省主席赵戴文的推荐下,阎锡山同意派杜任之去孝义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杜任之到孝义地区后,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限制日军向阎管区进行经济渗透。1943年

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孝义县兑九峪、清虚宫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作了一次题为《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的报告,说:“老百姓饿肚子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粮食,还硬逼着征粮,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这明明是要他们的命么!”他的这段话被第二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薄右丞向阎锡山加油添醋地作了汇报,说杜任之在孝义地区要搞“政变”。当地驻军的一些军官也向阎锡山诬告“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等等。阎锡山一怒之下,即于1943年4月22日密电下属:“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赵宗复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给其父赵戴文送信希望他设法营救。赵戴文亲自多次向阎锡山讲情。省政府秘书长王怀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在赵戴文的授意下,也拒绝在责令杜任之“自裁”(自杀)的高干会上签名。他们的行动,影响了多数高干。由于赵戴文的力保,杜任之才幸免于难。

1945年4月26日,时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民族革命同志会高干的梁化之,带人手执所谓“重庆中央电令”的名单,将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下的“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党员和进步演员王负图、赵辛生等13位同志,以“共党”嫌疑拘捕审讯。经赵宗复上下调查了解,摸清了此事并无任何根据,遂示意剧宣二队派人将该队受迫害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和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纸作了透露,使上述各报都发布了这一消息;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田汉、洪深等向“剧宣二队”致电慰问;张治中、陈诚也去电向第二战区政治部询问究竟。梁化之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将13位同志无罪释放。

### 陪同中外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

1944年6月初,一批中外记者获准去延安参观访问。赵宗复受阎锡山之命,以长官部少将参事的身份,偕同精建会秘书长徐士珙(赵宗复的姐夫)、英语翻译阴纫斋等人陪同参观团,由山西省吉县克难坡奔赴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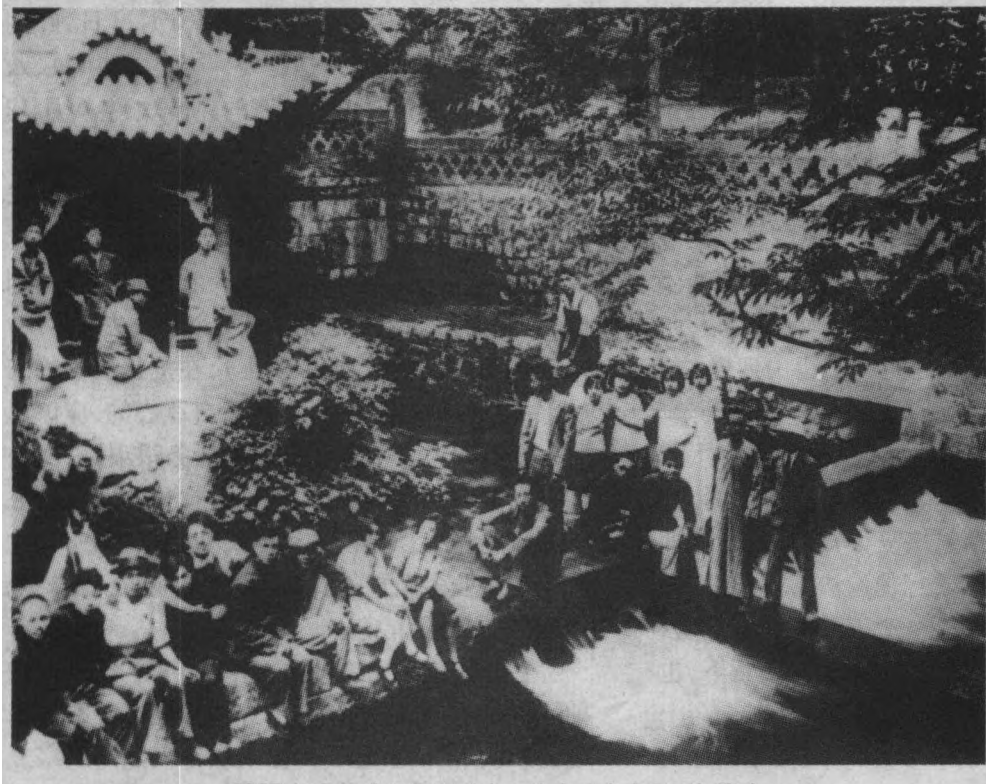
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

震首先在南泥湾接待了参观团。6月9日,叶剑英、王震陪同参观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情欢迎。6月1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赵宗复除随团活动外,还分别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仅毛主席就单独会见过他两次,并送给他一件呢子大衣作纪念。临别时,毛主席恳切地对他说:你父亲已故去了(注:赵戴文于1943年12月逝世),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他倾向我们。他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开明人士喽!你今后的任务很艰巨,回去后要向阎锡山多做工作,让他走抗日的道路。毛主席鼓励赵宗复要在二战区长期潜伏下去,为党的统战事业多做贡献。话毕,还与他在杨家岭吃饭,在枣园合影留念。

在延安期间,赵宗复还会见了薄一波、徐向前、南汉宸、杨尚昆、续范亭等领导同志。在赵宗复的影响下,同去延安的徐士珙不仅随同赵宗复一起受到毛主席的宴请,而且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部达成互通有无的贸易协定,同边区平渡



赵宗复



1937年6月4日牺盟总会工作人员在太原晋祠聚会

关西岸盐业公司签订了以二战区 10 万斤熟铁交换陕北马花池盐的合同。赵宗复、徐士珙等回到克难坡后，阎锡山亲自接见了他们，但未表示支持与边区的经贸往来。

## 配合解放战争 继续奋战在情报战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阎锡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身上，并很快派大军向晋东南解放区进攻。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搜集更多的情报，赵宗复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重新调整了地下工作人员的斗争岗位。他首先通过徐士珙将赵中枢安排到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任经理（徐任总经理），掌握了更多的有关阎锡山部队军火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情报。紧接着又通过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的帮助，将共产党员阴纫斋调入外事圈，担任了外事处长，接触了许多美国军官、新闻记者，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为我方代表与美、蒋、阎三方代表进行斗争提供了重要信息。赵宗复本人则担任了太原市著名的进山中学的校长，并在进山中学发展进步力量。1946年夏，他的周围已经有

王纪堂、韩建民、刘鑫、乔亚、卫兴华、梁九菊、杨盛钦等一批骨干，使进山中学成为太原市开展民主运动和争取自由解放的一块革命阵地。1946年，这个中学先后有两批进步学生投奔到解放区，参加了解放战争。

1946年春，太行军区情报处派我方情报人员王天庆潜入太原，并通过其弟王麟庆与杨盛钦、梁九菊、乔亚、卫兴华取得了联

系，又通过他们和赵宗复接上了头，于1947年春正式建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总站，对外称太行军区第八兵站，代号“909”。

1946年2月，阎锡山的“同志会”改选高干时，赵宗复被选为“候补高干”。他利用这个身份，离开进山中学到山西省政府新闻处任处长兼《工商日报》总编辑，后又担任教育厅厅长。期间，他除去源源不断地将搜集到的各种情报通过“太原工委”、“909”情报站送到解放区外，还化名在《工商日报》、《复兴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阎锡山当局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和奸商囤积居奇祸害人民的种种罪行，以提高人民的认识。他主持的《工商日报》，发表文章时从不用“匪”字称中共，不把共军称为“匪军”；报纸敢于发表矛头指向蒋、阎独裁专制和发动内战的社论；还开辟了《读者观察》专栏，陆续不断地发表了不少揭露当局政治黑暗的读者来信，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1948年8月下旬，在赵宗复的策划下，乔亚、刘鑫、韩健民等地下工作同志，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的重要情报，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区。但在运送情报的途中，曹瑞亭被捕叛变。8月31日和9月1日，赵宗复、刘鑫、韩

健民、杨有多、卫吉祥等相继被捕。在被捕的人中，乔亚牺牲，刘鑫等因敌人未获得确凿证据被释放出狱，而赵宗复由于同阎锡山的特殊关系，先后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务处头子杨贞吉和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头子梁化之家中吃住，并在梁化之严密监视下到教育厅上班。刘鑫等人获释后，巧妙地同赵宗复取得了联系，他们又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太原市敌人后期完成的碉堡、地道、明暗工事等详尽的城防设施情报，并先后派人分三次将这些情报送到解放区，对解放太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2月底，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起义掩护赵宗复、梁维书、刘鑫等9位同志到解放区。这一计划不幸被敌军师长李子法发现向阎锡山告密，1949年3月6日，上述人员一同被捕。3月10日，刘鑫等8人英勇就义。赵宗复则被关押在太原阎锡山公馆的后北厅，派6名卫士看守。卫士中的杨远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他们在看守赵宗复时受到他的教育，觉悟有所提高。赵宗复在被关押期间，通过杨远有给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写了一封信，请他搭救。3月中旬，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赵宗复时，特警处中将代处长徐端主张立即枪决。吴绍之则对阎锡山说：“请会长（指‘同志会会长’）回忆一下副会长（指赵戴文）的临终托言（作者注：1943年12月赵戴文在病危时，曾对阎锡山说：‘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答：‘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教育他，你可放心’）……”阎锡山在吴绍之提醒之后说：“把宗复交给我处理吧！”当有人再次提出何时处置赵宗复时，阎锡山说：“在太原城破，我成仁的时候，我一定要他跟我一起走。”3月29日，阎锡山受李宗仁之邀，突然飞往南京协商“和谈”。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从看守赵宗复的卫士中抽走4人护卫她的住宅，把看守赵宗复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杨远有、白建恩舅甥二人。杨远有给赵宗复准备了一套军装和一套便衣，想让他化装潜逃。赵宗复说：“根本跑不出去。再说这样做恐怕还要连累你们，只希望我死后，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同乡赵中枢就行了。”4月20日，山西省政府各厅的厅处长都到省政府二号楼集体办公，每人发一瓶剧毒药准备集体“成仁”。杨远有判断，杀

害赵宗复的事就要发生了。于是，他嘱咐外甥白建恩一步也不要离开北厅，如有人强行要进入就开枪打死他。4月21日，太原解放前三天，省府大院不时有炮弹落下。为了安全，杨远有、白建恩将赵宗复转移到专为阎锡山修建的一个地洞里去，还预先在里面准备了半袋馒头，一壶水，以及一箱手榴弹、半箱子弹、两枝手提式枪，以防特务强行进入杀害赵宗复。4月24日凌晨，敌人果然来毒害赵宗复，但因省府大院炮弹遍地开花，敌人不能进入地洞，谋杀未遂。10时许，解放军攻下太原，打进了省府大院，赵宗复终于幸免于难。

## 解放后历任要职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宗复先后担任过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厅厅长、山西师范学院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要职。他还当选为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民革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他在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工作的16年间，十分注意争取团结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教授。他识才、爱才、尊才、用才，被誉为“知识分子的知音”。

但是，这样一个冒着生命危险、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坚强革命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这段历史，受到种种诬陷，遭到“造反派”无休止的批斗。由于不堪忍受对他人格、尊严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诬陷，1966年6月21日，刚过51岁的赵宗复含冤辞世。他逝世后，“四人帮”一伙又采取虚构证据、捏造罪名等卑鄙手段，对他再一次进行迫害，并株连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家属亲友，还丧心病狂地掘开他和其父赵戴文的坟墓，使其一家受尽凌辱。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山西省委推翻了强加给赵宗复的一切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市双塔寺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赵宗复骨灰安放仪式，肯定了他革命、战斗的一生，恢复了这位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来面目。（责任编辑 林耀）

#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回顾十七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际遇

● 李一鑫

欧洲文艺复兴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那么,作为中世纪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的少数国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吗?

1935年蔡元培先生应《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之请,为该书所写的《总序》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欧洲文艺复兴历三百余年,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人所共知。蔡先生期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新的条件下,鉴他山之石,借后发优势,在行进速度和所起作用方面,“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

这番言语中所洋溢的,是这位年高德劭的学者、大教育家兼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对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个性解放在中国早日实现的热切期盼。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待完成的文艺复兴》,接过蔡元培先生的话头,呼吁再经“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现在,距五四运动已有84年了,距蔡元培先生提出上述期待也将近70年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尽管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民主建设仍然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今天,由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提出,而责无旁贷地要由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新一代接过来的文化启蒙,恐怕就不仅仅是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以个性解放为大纛的文化启蒙,而应更进一步,掀起一场理所当然既涵盖其旧内容,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要求的更高境界的全新启蒙,以告慰前人,昭示后世。

当然,第一步还是先学习世界历史现成的遗产,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前进创新。这是个难度极大却不容推辞、不容绕过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不能说五四运动仅仅是因当时反动政府一纸卖国条约激发起来的,它与清末民初几十年由潜流细流而成为洪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而清末民初的启蒙,又与上溯二百余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发起于民间知识层的启蒙运动,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关系。那是一次完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然而,说中国在三四百年前就已发生过类似欧洲



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这就牵涉到一直存在的争议。不同意者认为:一、明末清初的启蒙根本无法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因为缺少鲜明的以个性解放、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内涵;二、中国的启蒙未成气候就半途搁浅了,从来没有起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历史作用。因此,不能任意比附文艺复兴。

这种指摘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恩格斯对15世纪以后的伟大启蒙运动曾有的很多名称颇不满意。如:作为其发祥地的意大利,把它看作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称其为五百年代;德国人因这场运动有着反宗教特权的内涵,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则叫做文艺复兴,并从此渐渐成为那场启蒙的通用简称。恩格斯却认为“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马克思选集》第4卷261页)这样看来,文艺复兴也只是差强人意的简称之一。特定历史事实当然无一相同,但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却往往发生“何其相似乃尔”的历史现象。本文借用“文艺复兴”一称无非是突出所述历史现象的相似性。

明末清初发生的那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间相近而又性质相似的启蒙运动,不像后来在欧风东渐影响下,从晚清开始酝酿到五四爆发的那一次启蒙,而是在东西隔绝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发展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启蒙运动。

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但它完全是中华文化孕育的一朵奇葩,因而值得我们骄傲;它在蓓蕾阶段就遭受了摧残扼杀,因而值得我们痛惜;特别是,两相比较,它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又比欧洲文艺复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值得我们问一个何以如此?进而从回味、深思那一段史实中总结经验教训,用以认识我们的特殊国情,从而有益于导引、推动今后的启蒙。

### 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 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举世公认,中国在中世纪的很长时期内有过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中国工商业文明同样源远流长,因而在中国史学界曾有过在明清

之际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这场争论至今并未完结。而当时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素或萌芽,则是当时中国可能不可能出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共产党宣言》)

欧洲文艺复兴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工商业文明繁盛之地,新的市民阶层聚居之区,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既然中国当时生长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那么从这样的“旧社会内部”,“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即手工工场制为主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出现为这种备受压抑的“新社会的因素”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呐喊造势的思潮,应该是毫不奇怪的。相反,从一个老早就领先于世界的农业社会内部却生长不出“新社会的因素”,倒是有悖于历史规律的。

但是,还是让我们用史实来说话吧!

中国经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唐宋累积下来,到元明清时生产力的档次和水平,比之当时的西欧如何?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议论颇热。在诸多论据中,人们常提出的两个论据,一是描述中国元朝经济发达状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是明初即15世纪初叶中国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郑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对马可波罗的话不大相信,甚至认为马氏根本就未到过中国。西方人总是不大肯接受中国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经济上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一百一十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之行,却有力地证明了《游记》所言非虚。这论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及其28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纪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0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的无不及。这些,已有论述多多,本文不赘。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在历史已无误地证明当时中国生产力居于世界前列的条件下,中国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进程 和人口流动高潮

人们知道，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必须由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已故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认为，元明两代是中国个人手工业向集体手工业工场转变期，而且除官办以外，也出现了民办产业。家在华亭县（今属上海）的明朝大学士徐阶家里就雇佣 1000 多人，兼营手工纺织工场。这样的作坊——工场，在 14 世纪的江南普及很快，吸引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工匠。《明宣宗实录》记载，当时城市的工匠已接近 26 万人。而非农人口比例扩大，无疑是社会转变的重要信号。

流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得天下后，总结自身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深感流动人口（包括商人）乃安定之大患，严禁流民便成了明朝一项重要国策。除颁布联保连坐的严法不准农民离开土地外，还实行以高税收为主的抑商方针，以及严禁沿海人民出海的海禁政策，要后代务必执行无误。尽管如此，已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国农业文明仍是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有关的是人口总量增多，从封建盛世唐朝开元年间的 1699 万，到明朝万历时已增加到 1.5 亿，清乾隆时又增至 3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寻找出路，天灾人祸也往往使破产的农民走出乡土。“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司马迁语），城镇工商业迅速兴起，犹如磁石般从农村吸走劳动力，而随着运输量的增加，船工和码头工也都成了热门行当，结果是流民大量增加。

明朝中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两岸这个十字交叉的宽阔地带，一批工商业城镇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现。即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扬州、苏州等古城，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速度也很快。词家姜夔描写宋末被南北战争破坏的扬州景象是“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好像一代“淮左名都”从此要沦为废墟了，可是到明朝扬州又迅速恢复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商城；后来，史可法据此城抗清，又使扬州遭受空前的屠城惨祸，岂料仅数十年后，到康熙时，它就又以盛妆靓貌迎接清帝多次眷顾了。苏州有

2500 多年建城史，但先前是作为春秋时吴国都城，隋唐开凿运河后才渐渐成了商业中心。明清时苏州已然“半城万户机声”。苏州刺绣馆中 200 多米的《姑苏繁华图》长卷，碑刻馆中的 226 块经济史碑刻，记载了苏州商业资本主义萌生的史料。枫桥胜迹馆则描绘了自枫桥到阊门“市廛鳞列、商贾云集、居货如山积、行人似水流”的市井繁华景象。

更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盛泽镇。只是由于当时商人集中在这个地处江浙之间的码头收购蚕丝，进而又逐渐兴办丝绸作坊，在明朝中叶百余年里，它由运河边上一个普通村镇，变成拥有 20 万人口的“绸都”。在江南，像盛泽这样快速城市化的事例很多。这种城市化的飞跃，乃是自然经济初步走向商品经济的飞跃，演绎着资本主义怎样萌芽于封建社会土壤中的伟大史剧之细节。

经济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时一些或明或暗的行会行帮空前增加。它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为保护各种行当从业者的经济利益，进而就由此发展成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明中叶一种名为“叫歇”（一声呼叫大家都歇）的罢市罢工出现了，抗税抗监行为与日俱增，有时甚至采取流血形式。这是新生的社会阶层有了初步阶级意识的反映，是经济要求折射为政治要求的反映，在新阶层没有达到一定数量时，是不会出现统一的有威力的“叫歇”的，因此很有时代意义。二是，抗命出海经商被视为走私，抗拒缉拿便被视为“海盗”，这些“海盗”又往往得到陆上商民的支持，发展到攻城略地。这是当时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对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动，成了明朝东南地区大患，与内地农民造反一起，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三是，由于国内的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出现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这些移民不但使“海盗”孽生不绝，并使大量财富转移海外，变成他国的民营资本。西欧国家其时正鼓励向海外移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而中国朝廷却对出海者“剿杀无赦”，遂使勤劳勇敢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遭受两面夹击，处境极其艰险。他们非但不能为家山故土赚钱增富，而且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几百年海上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否则今日中国海外胞裔何止 5000 万！必须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

上的斑斑血迹，比之西方同类历史的血迹多得多，而又由于这萌芽终于未能冲破头上过于厚重的土盖子，它就更具富于令人鼻酸的悲壮色彩！

##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残喘的皇权统治

当初，出身甚低而智商颇高的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劝告，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间鼎成功。此后他念念不忘这九个字，以致整个明朝的政策都是这九个字的延伸：禁海、修长城、不跟外国往来，是“高筑墙”的延伸；厉行以农立国而压抑商业，自矜于悠久的农业文明而蔑视、拒绝商业文明，是“广积粮”的延伸；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永’称王”（缓称王目的在永称王，永远保持皇权）。但是，当时地球上已现端倪的新社会形态的特点是开放、竞争、扩张，是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从而使生产力高速发展，而“高筑墙”等九字诀却是封闭、保守，固守中世纪的农业国地位。为了维护皇权，明朝还废除宰相，使权力更加集中于一人，甚至设立厂、卫，用特务手段监视和惩治臣民。同时，明朝还强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德治”，规定蒙学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经典。这些对后来中国发展路数的影响很深，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遗产。历史已证明，九字诀在封建时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术，但到了近现代却绝对是糟糕的治国经。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立国时，已是西方开始限制君权之后，是立民主宪法之雏形的英国大宪章运动之后 153 年和英建国会后 103 年，法建国会后 66 年，也是掀开欧洲文艺复兴第一页的诗人但丁逝世后 57 年。

强化专制并未能有效减缓来自朱氏家族以外的夺权威胁，却使家族内的争权激化。自明成祖朱棣杀侄篡权始，明朝（包括南明）皇室内部充满血腥和阴谋的争权事例，粗粗算来就不下 12 宗。与此相关的是，朱元璋立国时不许太监干政，但明朝太监干政祸国的事件最多，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丑闻遗臭至今。朱元璋曾警告其后代不要让太监读书，但从他四代孙朱瞻

基起就破例在宫内设学堂训练秉笔太监，替皇帝批阅奏折和起草谕旨。何以必须如此？因为越强化专制，权力圈越小，除身边人外几无可信任之人。太监是阉奴，不可能有后，也就不大可能有篡位野心，因而可作贴心人使用。明朝太监当监军、钦差、税使、矿监，乃至掌管特务从而专擅朝政的很多，朝野恨之入骨，又巴结惟恐不及。但说到底，各为其主的太监施展手段争宠弄权的背后，折射的是皇族内、宫苑内的深层权力斗争，更折射着专制权力诞生传承规则背后的某种规律。

## 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

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于狱中的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但是，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所评：李贽是“破坏性强建设性弱”的学者，因而还“不是一位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人物”。

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淫威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

到万历时期，官僚上层社会已经“越来越趋于凝固”，“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流弊所及，是一片套话，一片祥和，却“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相适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但这假象却使万历皇帝觉得天下大可放心，竟有 25 年不临朝理政。朝臣们阿谀顺从或保

持缄默的保住了官职，直言敢谏的被贬谪或削籍。曾谏言减免矿税的李三才、敢与权奸们论争的顾宪成等被罢黜的官员，却大受江浙商民的拥戴。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在野的政治反对派，于是一场大狱兴起，多位学者死难。当朝廷派校尉到苏州缉拿东林人士时，竟引起苏州全城“叫歇”。自发起来保护东林人士的市民赶跑了校尉，并打死其中几名。这一事件说明，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高度关心并企图影响政治了。

东林党虽被冠以“党”（那是它的对头加于它的，因为一涉结党便是大逆不道）字，却与西欧的政党绝然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臣道的“救正”者，反对的只是太监、佞臣，顶多加上昏君，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对天下议论国是、开启言路是一大鼓励；他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首辅，并起用耶稣会士，准备修改历法；或许是出于怀柔政策，他容忍了大海盗（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发展势力，从而实质上弃置了禁海法。这些说明，崇祯比之明朝所有皇帝都开明一些，一时使明末风气颇有改变。就在这稍微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崇祯六年，复社在苏州举行成立大会，由于官方允许商家赞助而盛况空前，到会者近3000人。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是皇帝“涂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就说他青年时受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极

深。顾炎武则痛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反对“天下一切之权收之在上”，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王者，不可擅天下之土”，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

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这种不同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西方是所谓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权的共同肆虐，中国是宗法道德外衣下皇权的残暴统治。因而中西的启蒙也各有特色，异中有同，但同大于异，在现代环境下，完全可依据国情互补短长。

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这些作品中的很多极富个性的叛逆型人物，成为“书魂”，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喜爱，一直深远广泛地影响着社会。

## “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 及紧接而来的衰世

承接前代的发展势头，清朝全国的统一（这是清一大杰作）对经济的继续发展无疑起了正面作用。但是，清初野蛮的奴隶庄园式的圈地，强迫剃发留辫，关闭天下书院，禁止文人结社，连续不断的血腥文字狱，不平等的民族待遇，以及同样的抑商禁海，同样的崇儒尊孔，同样的加强皇帝专制，等等，使多数作为明遗民的士大夫看清了新朝面目而拒绝与之合作。一些思想家的作品在清代遭受冷遇，寂寂无闻。直到清末民初，他们

的思想才被为民主立宪而奋斗的新一代奉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扬。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西方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帝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不像朱元璋那样干脆杀掉巨商,而是收买他们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这种钦赐的官僚资本自身长不大,却配合官方政策压抑了民间资本。稍有成就的晋商徽商都因是封建附庸而非新式经济,而不能成大器。

明亡时复社成立仅六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四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后二人皆壮烈牺牲)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耶稣会士所传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冀图有所作为,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构成“名节”问题,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歿;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它本身先天后天的不足则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

到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为什么盛衰变化如此倏忽,对比如此强烈?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

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一论高低。明清两朝易姓而不易体制,共同维持了这块东方古陆500多年的超稳定架构,而同时的西欧各国却纷纷扰扰,内革命而外争雄,最终控制了世界。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已被尘埋,但仍可作为前鉴的东西依然大大值得挖掘。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和意识形态)对人民强大有余,对列强却软弱过分,此其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统治集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民没有被启蒙和动员,主人——人民没有利益意识和维权意识。因此,重视不重视、推动不推动民主启蒙,是对掌权者合不合乎时代标准,是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民之精粹”,还是民主主义者——听命的民之公仆的试金石。

有论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刻,本来可出现多条出路,但终于选择了向宗法封建的来路回归。真是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因而,与其说是拖着发辮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不如说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上层建筑的阻滞作用在一定时期竟也能占居绝对压倒优势,这在我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此时此刻,其教训怎么评说都不为过。(责任编辑 致中)

中国最大的传奇文学基地  
百万读者公认的大众品牌

# 今古傳奇

今古傳奇報刊(集團)總社系列產品

## 今古傳奇

### 單月號

郵發代號:38-83

逢單月1日出版,每冊定價9元,  
全年6期共54元。

中國最有影響的傳奇大刊 百萬讀者公認的大眾品牌

## 今古傳奇

### 雙月號

郵發代號:38-373

逢雙月1日出版,每冊定價9元,  
全年6期共54元。

大傳奇 大結局 大紀實 眾所周知的人物 鮮為人知的故事

- 今古傳奇·故事版(上) 郵發代號:38-349 每月1日出版,每冊定價3元,全年12期共36元。
- 今古傳奇·故事版(下) 郵發代號:38-12 每月15日出版,每冊定價3元,全年12期共36元。
- 今古傳奇·武俠版 郵發代號:38-370 每月1日、15日出版,每冊定價4.8元,全年24期共115.2元。
- 今古傳奇·文壇版 郵發代號:38-15 每月1日出版,每冊定價3.8元,全年12期共45.6元。
- 湖北畫報·奇幻版 郵發代號:38-1 每月1日出版,每冊定價4.8元,全年12期共57.6元。

《今古傳奇》系列刊,本本都好,請直接到附近郵局訂閱。如果错过了訂閱時間,也可以直接匯款到本刊讀者服務部訂閱。電話:027-86782463 本社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417號 今古傳奇報刊(集團)總社 郵編:430077 服務質量舉報電話:027-86789625



# 谈谈“为尊者讳”

● 迟泽厚

为尊者讳，是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所谓尊者，在旧中国主要是帝王将相（自己的长辈也算尊者，但这难以相提并论），在没有了皇帝的中国，则指那些称呼不一的位尊权重者。为尊者讳，即为了维护“尊者”的尊严，而对其行为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尊者讳在中国由来已久，孔夫子修订的史书《春秋》，可算是古代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稍后于《春秋》的《公羊传》就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时光流逝几千年，而为尊者讳至今仍未绝迹。

## 为尊者讳二例

为尊者讳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历史人物脸谱化，好者绝对地好。不妨试举现代史的几个例子：

其一，讲起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而惨死的彭德怀元帅，大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战争中，面对强敌横枪勒马的彭大将军；在朝鲜战场统兵百万打败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略联军，在庐山会议上置个人前程命运于不顾，“为民鼓与呼”的永不褪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量记述或评论彭德怀的文章，正是这样写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德怀也曾有过令人扼腕叹息的重大失误。例如，1958年5月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

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谁曾料想，仅仅一年之后，彭德怀本人在庐山会议上，只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提了一点不同意见，便被打成“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头子！受此致命打击的彭德怀，在他遭受无尽无休的审查和批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身陷囹圄之后，这位生性耿直的共和国元帅，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对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对一年前发生的失误，是会作深刻反思的。但是，令人诧异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主要根据彭德怀受审查期间所写材料，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其中多有彭德怀对各个时期是非得失的检讨，却唯独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只字未提！这究竟是彭德怀本人的疏忽，还是编者为了维护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形象，像在《出版说明》中所说：“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呢？无独有偶，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官方史料在提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时，虽然都对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左”的做法予以批判，却都完全不提彭德怀的名字。这总不会是偶尔疏忽吧？

其二，1967年2月，在被江青一伙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中，“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江青一伙倒行逆施乱党乱军的罪行，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毛泽东在听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告状之后，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几位老同志给予严厉训斥。随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共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对几位老同志进行批判。几位老同志都违心地作了检讨。这是十年动乱中的重大政治事

件。打倒“四人帮”后,有不少官方材料对几位老同志当时同江青一伙(主要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情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虽然早已时过境迁,读来仍感惊心动魄。但是,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批斗以及他们作检讨的情况,各材料则都讳莫如深,付之阙如。关心此事的人们,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几位老同志的不同处理上: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被认定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被打成“叛徒”,实行“专政”;其余各人则都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有的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显然是与他们在事件中的地位、作用、影响以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等有联系的。倘若把这方面的情况也一并作些交代,对这桩公案的记述就完整了。

### 为尊者讳与贬损“卑者”

既然为尊者讳,对尊者溢美,与此相对应,则必然对“卑者”贬损溢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谓“卑者”,即各种“反面人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卑者”,原来还曾是至高无上的“尊者”。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林彪。当林彪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时,把世间一切赞美之辞用在他的头上犹嫌不足。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连揭带批,说他从根儿上就是一个坏蛋,投机革命,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又没一点真本事,打仗右倾怕死,甚至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遭批判,说是对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后因仍须肯定平型关战斗,于是又称林彪只是“参与指挥”了这次战斗;还有林彪在东北战场提出的“六个战术原则”,也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是右倾军事路线的产物,是打败仗的战法。但因这些原则经过实战检验不仅被东北(第四)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而且也受到其他战区的欢迎,争相仿效推广,想要否定已不可能,于是又改口说这些原则是东北战场广大指战员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集体创造,云云。这就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 为尊者讳无从以史为鉴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从一有文

字便在中央政府设置史官,以后连一些诸侯国也都纷纷设置史官,历朝历代修史不绝。修史是为了用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古即是历史,兴替则是是非、得失、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就可以对前人的成功经验择善而从,同时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保证国家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发展。对于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后者比之前者更为重要。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段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可见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倘若态度端正积极,坏事确实可以变成好事。反之,如果领导者拒谏饰非,周围又有一帮人为尊者讳,那就势必要犯更大的错误。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原定纠“左”变为反“右”,其结果是接踵而来的饿死上千万人的三年大灾荒,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齐心协力整治为尊者讳

为什么为尊者讳会成为难除的顽症?其关键在于有的“尊者”乐此不疲。邓颖超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谈到党风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抬轿子,是因为有人坐轿子。问题就出在有人不但爱坐轿子,而且对抬轿者给予重赏,于是这个本属“下九流”的卑微行业便有人趋之若鹜了。

这些年来,有些“尊者”在物欲得到某种满足或达到某种目标之后,又将注意力转向沽名钓誉或雇请枪手,炮制各种树碑立传之作;或篡改于己不利的历史文献,并不准知情者讲真话。这种人自以为得计,怎奈历史并不是可以随便捏的面团儿。他们忘却了一个基本常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何况还有一个爱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史学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将揭去。

解决为尊者讳的主导方面在于“尊者”,但对矛盾的另一面、即写作队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些把作品当商品,迎合市场需求,长于猎奇“揭秘”和标新立异的杂牌队伍不去讲它,主流队伍总体情况还是好的。但也确有一部分人为求自保而唯上、唯书,谨守诸多(不只两个)“凡是”,缺少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浩然正气。其实,中国史学界是有秉笔直书的光荣传统的。且不讲古人,解放前史学家吴晗写了一本《明

史》，只因其中有“红军”二字，犯了国民党的大忌，要求将“红”字改用他字方可出书，吴晗宁可书不出版，“红”字坚决不改！这种坚持真理、维护历史尊严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民主制度的

逐渐完善，随着一个宽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的形成，为尊者讳的市场将不断缩小，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责任编辑 仲文)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7.00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回首残阳已含山	殷毅	16.00	4.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门 祝东力	17.00	4.00
刘少奇之路:(全四卷)	胡长水 林蕴晖等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们 肖思科	28.0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航天情——永远的眷恋	彭洁清	16.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	29.5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18.0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诚	22.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28.80	4.00
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	13.00	3.00
虽九死其犹未悔	叶笃义	15.00	3.00
生命的风景	吴冠中	23.0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4.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4.00
我陪胡风坐牢	梅志	19.80	4.00
百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希	25.00	4.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帆	25.00	4.00
断桅杨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4.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斯大林——胜利与悲剧》本书由苏联新闻社出版社1989年出版，作者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研究所所长。在洋洋上百万字、1470页的巨著里，作者以详实的史料，勾画出一个革命者转化为独裁者的历史，考察了这个人留下的带血痕的时代。这是一个谎言、残暴、冷酷、梦想、巨大的悲剧和巨大的成就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书中充满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这一切记录都源于扎实的可靠的原始档案。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是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交锋》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三次思想解放的过程，把20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你面前，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改革开放史。它贯穿了一条防“左”反“左”的主线，《交锋》中描述的许多事实，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你想知道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吗？你知道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吗？

《李锐其人》李锐著作颇丰，是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之一，人们读过李锐的著作，对这样一位敢于直言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充满敬佩，本书详细的叙述了李锐从给毛泽东当秘书、参加庐山会议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以及平反后在中组部工作和再论三峡的坎坷经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 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 黄瑶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在信中还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但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林彪?笔者认为,除了因为林彪是解放军的领导人,正在受到毛泽东的信用以外,还有历史原因。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的影响。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上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把新村主义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日本的新村》,他说:“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7月,他又东渡日本,访问了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随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介绍了他的见闻。他的介绍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曾经受到这一学说的吸引。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

年,引者注)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在这一章中,毛泽东对半农半读的新村学校做了详细的计划。他提出,这种新村性质的学校将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访问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毛泽东此次同他谈话的内容未见记载,但显然同周作人当时正在介绍新村主义有关。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不仅写了《访日本新村记》,而且还作过介绍新村的讲演。他同武者小路实笃经常通信,当时可以说是在中国介绍新村的权威。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



武者小路实笃(中)在新村中劳动

1920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冈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到武汉,参加了织布厂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上世纪50年代回忆:

毛主席早期在长沙曾领导青年学生作过一次反军阀的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后率一队学生至北京。这队学生由京返长沙,路过武昌曾停留一个时期,以织袜为生,并与“利群”发生了关系。他们回长沙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文化书社和织布厂,并从利群织布厂调去林育英同志。育英同志就这样得亲受毛主席的教诲,而成了我党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干部。利群书社与文化书社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恽代英同志于1920年夏季特有湖南之行,访问了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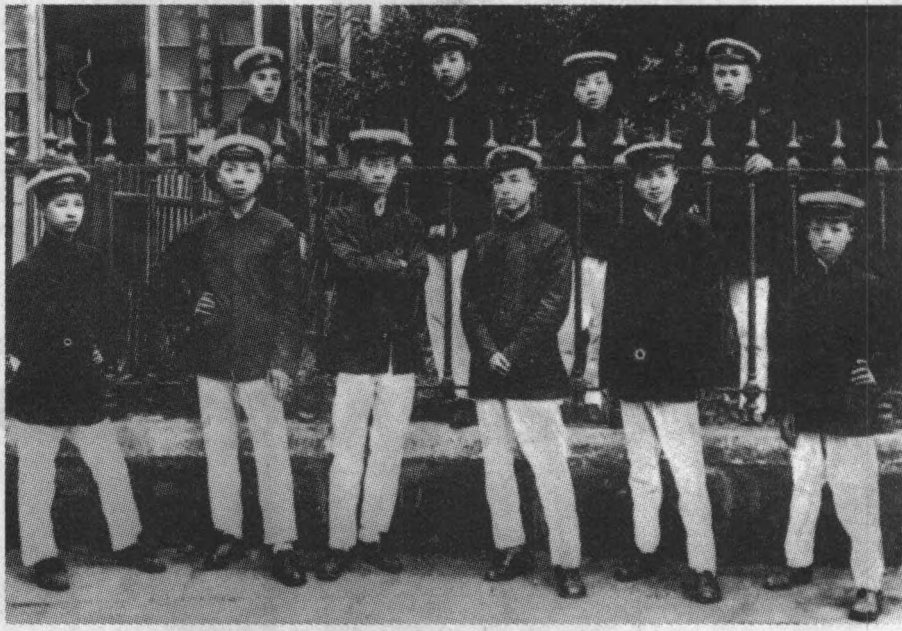
关于林育英赴长沙,还有一种说法是:1921年7月,恽代英邀集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廖焕星、李求实等24名青年在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共存社。这24名青年中有一位叫易礼容,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同时是由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毛泽东委托他到武汉学习利群毛巾厂的经验。他到武汉后,恽代英便邀请他也到黄冈来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便邀请林育英、林乐浦和一位姓邓的工人到长沙筹办织布厂。在长沙,林育英结识了毛泽东。

以上两种说法差距不大,都是说林育英早在1920年或1921年就到了长沙。毛泽东早在1920年至1921年就同恽代英、张浩有交往。他对恽、张都很



器重。

到了60年代,恽代英和张浩早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弟林彪还在。毛泽东所以把这封信写给林彪,不仅因为林彪是当时军队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把林彪引为同志和知己。在他的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尽管1917年互助社成立时,林彪实际上只有9岁,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已是互助社的成员了。毛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说,在他



互助社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恽代英、第五人为林育南

组织新民学会的同时,“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也是在1920年,毛泽东同恽代英等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新村主义是空想。新村主义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不赞成暴力革命;二是不认为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条件即可实现新村理想。但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在第一个问题的层面上批判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即它否定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必须具备的前提。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批判新村主义,即它不注意创造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一条件。忽视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同样也是空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还认为,因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他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中国已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实现其新村的理想了。至于生产力,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将自然而然地为它的

发展开辟道路。在1958年,他就尝试过,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是失败了。到1962年,当人民公社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时,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却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这更使毛泽东引林彪为知音。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仍然没有注意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条件,而认为关键是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因此,他在即将到来的由他亲自策划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建设公社的实验。于是,写了这封信。

至于林彪是否也有类似的理想呢?林彪早年在不多的场合也曾谈过他的社会理想。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说过:“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1949年2月8日,他在同傅作义的谈话中曾将共产党人的理想概括为“建立革命的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建立工厂,开发矿山,遍设铁路公路,遍设学校,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提高文化,讲究卫生,能过富裕自由的生活”。显然,这同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差距甚大。到了晚年,林彪甚至私下里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但表面上还装扮成毛泽东的捍卫者。

显然,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勒的共产主义的蓝图是脱离中国当代的实际的。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宋教仁： 不该遗忘的宪政精英

● 陈章



宋教仁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然而，有一位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

立民主共和国出生入死、竭忠尽智，堪称近代中国宪政专家的精英人物，却为时人所遗忘。他叫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

宋教仁为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次年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又与孙中山组织成立同盟会。1910年冬回国，在上海主编《民立报》，呼吁民主、宪政。第二年与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起义后奔赴上海、江浙等地，组织革命军攻克南京，并筹建临时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到北京出任农林总长。国民党成立以后任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系统的宪政理念。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工作勤勉，翻译过《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等十多个国家的宪政著作。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等著作传世。

清末，中日发生间岛事件争议，他根据高丽古迹遗史写出《间岛问题》一书，使中方在谈判中获胜。当俄国企图派兵驻守撒拉时美时，他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以翔实的史料考证撒拉时美即中国古来之承化寺，各国舆论为之折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对他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辛亥革命后，宋教

仁急赴武昌，帮助武昌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21条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约法已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局长，多数法律条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有人尊其为民国蓝图的设计师，一点都不过誉。

宋教仁还是位出色的诗人，黄花岗起义中陈更新牺牲时，他作两首七律吊曰：

## 一

残月孤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  
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  
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英名。  
伤心汉室路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 二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  
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竟知兵。  
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  
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二诗同韵，韵律工严，用典贴切，格调雄浑悲壮，至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击节。绝非附庸风雅之辈所能为之。

宋教仁不但才华出众，而且卓见远识，人格高尚。在民主革命党人争议总统制和内阁制之时，他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反对总统制。分析说：“内阁不善则可变易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今天看来，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区别其实就是分权制与集权制的区别。后来的历史不幸地证明了宋教仁的真知灼见，袁世凯大总统“不善”，孙中山先生发动流血的“二次革命”，也不能“变易之”，如果不是袁自己翘了辫子的话。

宋教仁是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伟大实践者，他不恋权，不图利，高风亮节，世所景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袁世凯任总统后，百般笼络宋教仁，表示让他出任总理，他坚决不干。他想当的是应该符合他的宪政理念的民选总理。后来袁世凯召

见他，亲自送上贵重礼物和50万元巨款，他婉言谢绝。

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但宋教仁坦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并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临终前，嘱托诸同志照顾其老母；让于右任将其全部藏书捐献南京图书馆；请友人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至死犹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念念不忘！人杰鬼雄，至仁至义，一片冰心，可鉴日月！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遁初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责任编辑 仲文）

启迪人生智慧 伴您和您的孩子走向成功

## 《名人传记》

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杂志之一  
发行量居同类刊物前列

### 主要栏目：

领袖生涯 革命志士 科教名家 名人恋情  
焦点人物 军旅功臣 人物春秋 经营巨子  
环球人物 名人友情 艺苑奇葩 脱缰俊杰  
人生沉浮 体坛精英 名人自述 作家天地

邮发代号：36-80 国际标准 16开本  
全年12期 96页 定价6元 半年36元 全年72元  
出版：河南文艺出版社（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编：450002  
电话：(0371)5720440

# 兴衰荣辱“黄埔系”

● 徐平

黄埔军校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丰硕成果。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危亡,解决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提出创建革命军,这就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而当时在中国尚没有专门培养革命军政人才的学校,黄埔军校就是适应这种军事政治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并获得巨大成功。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孙中山亲任校总理,并委任他的两个主要军事、政治助手蒋介石、廖仲恺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建校时的正式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故通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在创建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热心于教育事业、有着丰富办学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的骨干。国共两党许多杰出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陈潭秋、李达、恽代英、萧楚女、项英、郭沫若等;国民党方面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或兼职,如蒋介石、廖仲恺、李济深、汪精卫、邓演达、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李宗仁、邵力子、顾祝同、刘峙、陈诚、张治中、蒋鼎文等。当时一大批国内军事、政治精英聚集黄埔,成为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中坚。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黄埔军校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1927年前,已由刚建校时的步兵单科发展为包括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经理、政治等多种学科,并在潮州、南京、武汉、长沙设立四所分校,师生人数增加数倍。1926年3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3月,在南京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9月,广州的黄埔军校停办,其培训陆军初级军官的任务由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承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至成都。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初,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成都,黄埔军校的大陆时期结束。1950年10月,国民党在台湾凤山续办陆军军官学校,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现在通常所说的黄埔军校,一般有两个概念:狭义的黄埔军校专指设在广州黄埔岛的军官学校,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六期;广义的黄埔军校则不仅包括广州时期,还包括1928年以后在南京、成都的中央军官学校,甚至延伸至后来在台湾续办的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在黄埔时期共招6期学生,南京时期为第7期至12期,成都时期为13期至23期,台湾时期为24期以后。前6期招生12000余人,大陆解放时的前23期,共招生30余万人。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黄埔毕业生中的许多人成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人民解放军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有40余人,其中上将以上有徐向前、林彪、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周士第、陈明仁、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郭天民等;国民党军方面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黄维、郑洞国、邱清泉、王耀武、胡璉、廖耀湘等。

在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形成了“黄埔系”,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控制军队的骨干力量,也是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以及1949年

以后统治台湾的军事支柱。“黄埔系”是国民党军队诸多派系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支。“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黄埔系”则是中央军的骨干和核心，是“嫡系中的嫡系”。由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开办的中央军校，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向来有“正宗”的优越感，加之蒋介石曾任军校首任校长，更以“天子门生”自居。蒋介石正是利用自己校长的身份，对黄埔学生百般拉拢、控制，使其甘心为自己卖力，成为他的御用工具。“黄埔系”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荣辱与共”，蒋介石靠“黄埔系”起家，“黄埔系”靠蒋介石扶植。没有蒋介石，就没有“黄埔系”；没有“黄埔系”，也就没有蒋介石。“黄埔系”忠于蒋介石，蒋介石信任“黄埔系”。因此，“黄埔系”成员大都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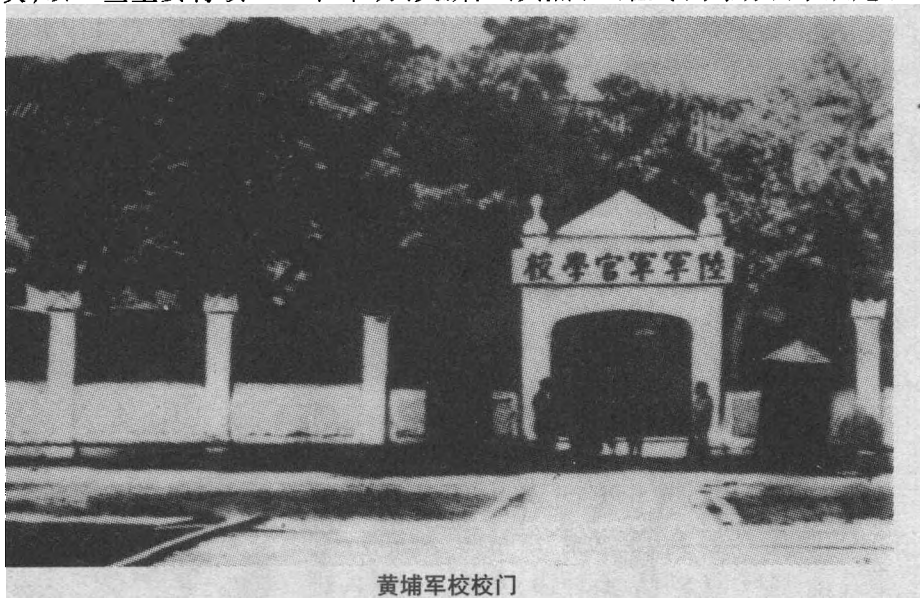
说起“黄埔系”，必须说明三点：第一，黄埔系成员不等于黄埔将领。黄埔军校毕业生并不都是“黄埔系”成员，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被蒋介石所重用并甘愿为蒋效力。虽然黄埔学生后来官至将校者不少，但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和军事骨干的，毕竟是少数。第二，“黄埔系”成员不完全是黄埔学生，也有不少黄埔军校教职员。一些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蒋介石心腹将领，靠黄埔起家，并成为“黄埔系”重要骨干，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陈诚、周至柔、钱大钧等。但通常是专指黄埔毕业生的。第三，黄埔系内部也分成若干派系。“黄埔系”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以一些重要将领为核心，形成若干派中之派，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较大的有何应钦系、陈诚系、顾祝同系、胡宗南系等。

“黄埔系”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十年内战时期，“黄埔系”初步形成。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冲杀在东征北伐的最前线，但绝大多数担任营、连、排长等初级军官。十年内战开始后，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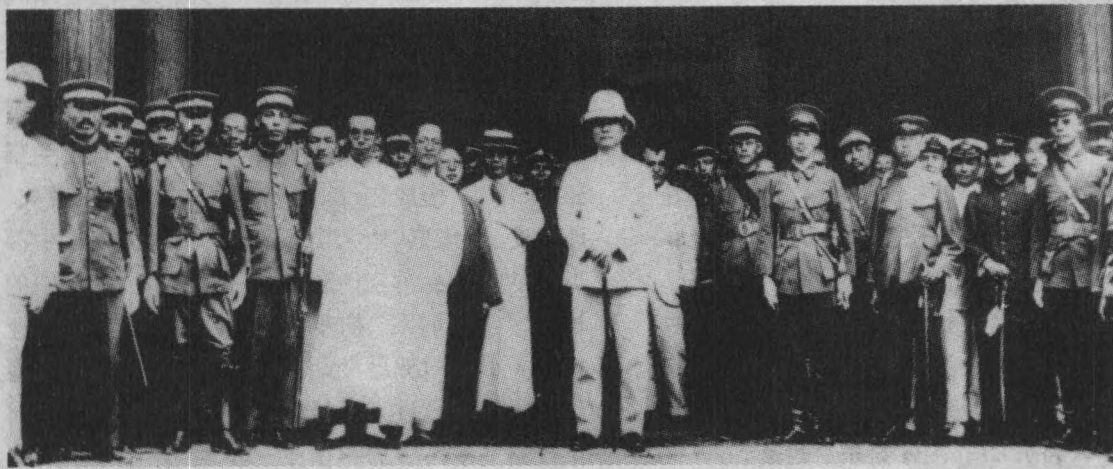
启用大批黄埔毕业生，中央军里，黄埔军官脱颖而出，比其他军校毕业生晋升快得多。到30年代初，毕业不过六七年的黄埔一期生胡宗南、黄杰、李玉堂、李延年、李默庵、萧乾、霍揆彰、关麟征、宋希濂、伍成仁、陈沛、陈明仁、刘戡、王敬久、孙元良、梁华盛、唐云山、李树森、罗奇、夏楚中都当上了师长，占当时蒋军嫡系部队27个师中的20个。“黄埔系”初步形成，在军界的势力迅速飙升。十年内战后期胡宗南当上了军长，标志着黄埔毕业生已进入高级将领行列。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基本军事力量由第一军而第一集团军，由第一集团军而中央军。而“黄埔系”成为中央军的核心，蒋介石则是中央军和“黄埔系”的领袖。

八年抗战时期，“黄埔系”羽翼丰满，势力壮大。黄埔毕业生在抗战期间，纷纷走马上任，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逐步完成了军界接班部署。军界新生代“黄埔系”开始与老牌的“士官系”（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等）、“保定系”（陈诚、顾祝同、刘峙等）分庭抗礼。1938年初，国民党正规军共编200个师，其中蒋介石嫡系部队40余个师，师长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13个军中，黄埔学生占据了9个军长的位置，而且都是一期生：胡宗南、李延年、黄杰、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俞济时、夏楚中。到抗战后期，蒋介石嫡系部队已发展到53个军，绝大多数军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国民党军队39个集团军中，“黄埔系”的杜聿明、关麟征、黄杰、王耀武、李仙洲、李默庵、



黄埔军校校门





孙中山(中戴白帽者)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济瀛、刘平、向敏思、姚国俊、赵子立、郭汝瑰、陈克非、王应尊、张涛等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回到人民阵

营。一些“黄埔系”成员，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中负隅顽抗，命丧黄泉。其中，在宜川战役被击毙的整编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在孟良崮战役被击毙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在淮海战役被击毙的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是“黄埔系”阵亡将领中最令蒋介石痛心的三员干将，都追赠为陆军上将，并树为“杀身成仁”的典范。“黄埔系”重要将领杜聿明、范汉杰、黄维、王耀武、李仙洲、宋希濂、廖耀湘、康泽、邱维达等人战败被俘，作为战犯关押改造，解放后先后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李默庵、侯镜如等则辗转海外又回到大陆。另一些“黄埔系”高级将领胡宗南、关麟征、俞济时、黄杰、胡璉、桂永清、郑介民、陈大庆、高奎元等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在大陆曾红极一时的胡宗南“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到台后不久即被弃用，郁郁而终；其他黄埔系骨干，大都得到重用，继续成为台湾军队的台柱，如桂永清、黄杰、王叔铭、陈大庆、高魁元、袁守谦、刘玉章、彭孟緝、刘安祺等，先后出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等要职。随着“士官系”、“保定系”成员相继退出军界，并且后继无人，台湾军队最终成了“黄埔系”的一统天下。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系”发展至顶峰直至在大陆覆灭。解放战争初期，“黄埔系”后来居上，在军界的势力已超过“士官系”和“保定系”。嫡系部队的军长、师长，基本上都换成黄埔学生。一些“黄埔系”分子自恃年轻气盛，素以“少壮派”自居，咄咄逼人，甚至不把“士官系”、“保定系”等元老派将领放在眼里。加之战争头一年，国民党军在一些局部战场连连得手，黄埔少壮军人更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军第一线的指挥官如“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司令官和军长、师长，大都由黄埔军官担任。“黄埔系”核心人物仍是一期生。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黄埔系”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裂变。潘朔端、陈明仁、唐生明、李觉、罗广文、李默庵、潘裕昆、刘希程、刘子潜、王凤岐、王劲修、石仲伟、方瞰、吴大鹤、刘

营。一些“黄埔系”成员，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中负隅顽抗，命丧黄泉。其中，在宜川战役被击毙的整编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在孟良崮战役被击毙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在淮海战役被击毙的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是“黄埔系”阵亡将领中最令蒋介石痛心的三员干将，都追赠为陆军上将，并树为“杀身成仁”的典范。“黄埔系”重要将领杜聿明、范汉杰、黄维、王耀武、李仙洲、宋希濂、廖耀湘、康泽、邱维达等人战败被俘，作为战犯关押改造，解放后先后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李默庵、侯镜如等则辗转海外又回到大陆。另一些“黄埔系”高级将领胡宗南、关麟征、俞济时、黄杰、胡璉、桂永清、郑介民、陈大庆、高奎元等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在大陆曾红极一时的胡宗南“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到台后不久即被弃用，郁郁而终；其他黄埔系骨干，大都得到重用，继续成为台湾军队的台柱，如桂永清、黄杰、王叔铭、陈大庆、高魁元、袁守谦、刘玉章、彭孟緝、刘安祺等，先后出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等要职。随着“士官系”、“保定系”成员相继退出军界，并且后继无人，台湾军队最终成了“黄埔系”的一统天下。

“黄埔系”作为蒋介石维持其统治的基本军事力量，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期是不遗余力的。但许多“黄埔系”成员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铲除军阀、抗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中华民族做过有益的贡献，这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殉职在抗日前线的诗人王礼锡

● 谢 琰

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  
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  
志在求仁仁自得，才堪率众众金同。  
湘江此日新传捷，誓扫倭奴以报功。

上面这首诗，是1939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各界追悼爱国诗人王礼锡大会上朗诵的。王礼锡1939年7月率作家战地访问团，在中条山进行战地访问中患病，送洛阳医治无效逝世。葬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长眠龙门西山已经6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王礼锡其人其事，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个别文化界人士写文纪念，他的后裔也曾到洛阳坟墓树碑，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及爱国主义精神，仍鲜为人们所了解。为此，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写成此文，对他作简要介绍。

王礼锡，江西安福县人，字庶三，生于1901年3月。7岁丧父，自幼从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就是他童年的作品之一。

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登高，校长以秋景为题命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赞叹不已。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作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他25岁执教于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时，已写有新、旧体诗千余首，并选编成诗集《困学集》。

大革命时期，因景仰三民主义，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媚上取宠。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使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逃出了虎口。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

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四省;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疯狂地向上海发动进攻。王礼锡这时在上海奋力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头一天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在《淞沪抗战号外》上,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2月7日,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人,联络一批作家、学者,在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淞沪停战后,王礼锡将他的《战时日记》,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十九路军和群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记述了日军破坏我国经济、文化设施及居民房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还记述了政府的对日妥协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这本《战时日记》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

## 二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任职时,他向陈铭枢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这个建议得到陈的认可。神州国光社原来是一家以出版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为主的出版、经营单位,自王礼锡接任主编后,即改变为以出版社会科学、进步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书籍为主。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



王礼锡 1934年3月于伦敦

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在外国文学方面,出版了鲁迅主编的《文艺丛书》,其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没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书籍。这些带有革命色彩和进步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多数出版社不愿或不敢出版的。

创办《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王礼锡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提出“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作忠实的介绍;革命文学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品一样的登载。”在第二期,他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对中国社会展开探讨与研究。他在《论战》的《前言》中指出:“现在是……正需要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该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试解。”《论战》第一辑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当年这场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当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 三

由于神州国光社出版了

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神州社的出版物被查禁;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发行分所均被查封。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权在福建成立。王礼锡于当年11月回国,参与起草了《人民权利宣言》、《政府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不久,“闽变”失败,他又被迫逃亡伦敦。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次会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任执行委员。这个时期,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内战不应再有,外来的侵略必须抵抗”;“中国没有所谓‘赤色恐怖’,外国的侵略,不能以‘消灭赤色恐怖’为借口。”

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原料,使一些生铁、钢板搁置在码头,迫使日本货船驶离港口。

#### 四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搞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共命运。

1938年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全英援华抗日运动总会主席高兰士、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著名作家贾克生等人 and 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席了宴会。

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前往参加。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  
现在血泊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我要归去了,  
归去赶上中国的春。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

在重庆,他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蒋介石听后,“唔”了一声,对此未表示可否。王礼锡在回答蒋“为何要急于奔走前线”问题时,动情地说:我是要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地位来工作。“为了号召国际的正义……我想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

这次会见后,国民政府授予王礼锡“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衔。国民外交协会增选王礼锡为常务理事。稍后,以孙科为院长的立法院又选他为立法委员。

1939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



王礼锡(左)和胡秋原(右)赴苏联途中

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当年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中弹炸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

## 五

1939年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他们是王礼锡、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李辉英、陈晓南、张周、方殷。经周恩来在会前的推荐,理事会决定由王礼锡任团长,宋之的任副团长。访问团的成员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他们郑重嘱咐:“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走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绵薄。”

1939年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并致词。6月18日访问团离开重庆到西安,在一次欢迎访问团的茶会上,一位国民党部官员竟然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唱赞歌,并且

还恶意地责问访问团:“你们文化人为什么不丢下笔杆、拿起枪杆来?为什么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王礼锡当即回答:“抗战需要枪炮,也需要笔杆。语言的子弹,能打穿敌人的面具和灵魂。这敌人包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日寇和汉奸出于恐惧自然要我们放下笔杆。不知这位先生为何也要我们放下笔杆?这位先生责难我们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我们写的都是揭露、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歌颂同胞抗战的作品,这位先生竟把它们看成对内,不是把自己划在敌人一边了吗?至于说到希特勒,我到过德国,耳闻目睹希特勒驱逐残杀犹太人的暴行。希特勒的理论是:日耳曼民族不能混有‘低劣’的犹太人的血……想不到现在竟有人与希特勒攀起同种来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希特勒的信徒已悄悄溜走了。

1939年7月13日至25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停留12天。其间他们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其他将领及部队官兵;参加了洛阳新闻界的招待会;到伤兵医院慰问了为抗击日寇而受伤致残的官兵。鉴于卫立煌统率部队在中条山一带抗击着五个师团九路进攻的日军,而且节节胜利,王礼锡代表访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干城”的绿色锦旗赠送给卫立煌。卫立煌在答辞中说:“卫国抗战,本是我军人天职。诸位隆重的盛意,我实在不敢当……诸位每一杆笔可抵10万兵,14杆笔将抵140万兵。这140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支雄厚的力量。”这是戎马半生的将领对作家访问团的赞誉。

## 六

7月25日,王礼锡率作家访问团由渑池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战地。当他看到波澜壮阔、浪

涛滚滚的黄河,不禁思绪翻腾,诗如泉涌,写下了《黄河南岸速写》、《渡河》两首诗。

在中条山,团员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冒着同敌人遭遇的危险,访问村民,访问战壕中的战士,访问游击队员,他们搜集了许多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寄往国内外多种报刊。

在晋南,他听说民间有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叫“红枪会”,拥有10万之众,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内瓦他曾参加过世界农民反侵略协会的筹备会,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民反侵略的组织。他打算把“红枪会”吸收进去。因此他和访问团专程去参加了绛县90余村“红枪会”的骨干会议。王礼锡热情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及全国抗战形势,希望他们参加国际反侵略农民协会。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欢呼。

在前线访问的日日夜夜中,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常常工作到深夜。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顾不得休息,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酷似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

(上接58页)

1.4×3.5米的巨幅油画《血战宝山路》就是在这个10多平方米的书房画的。

张云乔是刘海粟的学生,23岁那年,他为上海的“一·二八”纪念堂画《血战宝山路》主题壁画,展出时受到刘海粟先生的好评。后来这幅巨型油画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日纪念馆被日军飞机轰炸而毁灭。1995年,上海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淞沪抗日纪念馆”,几经周折找到张云乔。此时,张老已是87岁的老人了。但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挥洒爱国激情,经过300多天的奋战,凭着记忆将60多年前血战宝山路的场面重新绘出来。以后张老又绘制了同样的《血战宝山路》的

中,痛快地洗起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发冷,躺在床上,头脑阵阵昏眩。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军医诊治,当时诊断为感冒,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访问团决定将他护送至洛阳治疗。

他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十分严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8月31日,洛阳各界代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主持大会,访问团副团长、剧作家宋之的致悼词。

当年秋、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吉安、香港及国外一些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中央日报》、《抗战文艺》及国内外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王礼锡逝世的消息和悼念诗文。

王礼锡一生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有诗集《市声草》、《去国草》;诗评《李长吉评传》、《南北朝诗论》;论文、随笔《中国社会史论战(4)》、《战时日记》、《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译著有《家族论》(与胡秋原合译)、《世界经济体系》(与王亚南合译)。他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责任编辑 仲文)

巨幅油画和同类题材的油画,分别赠送给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纪念馆和美国旧金山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任凤仪退休前是珠影电影服装设计师,《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等影片的服装都是她设计的,曾获金鸡奖。她如今已83岁高龄,但依然开朗活泼,前几年还活跃在广州京戏票友界,算个名角。老两口到耄耋之年虽然有许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一点变不了,这就是他们之间半个世纪的理解、半个世纪的爱和共同的人生观:助人为乐,苦中寻乐,知足常乐,自寻其乐。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不负周恩来嘱托的传奇夫妇

● 杜 凌

他是艺术宫殿的才子,23岁时就有过传世之作;

他是商业奇才,在商场上曾经与荣毅仁并驾齐驱;

他是拳拳赤子,为了周恩来的嘱托,他用在职界的特殊身份做了许多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做不了的事情。

他曾经荣耀辉煌过,他曾经腰缠万贯,金钱像流水般经他手哗哗流过;他也曾经历过没有分文存款的贫苦日子,经历过被批挨斗关牛棚受冤枉的屈辱岁月。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委屈而到处申辩,没有因为自己对党对国家的贡献而居功,而去索取。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广州卷烟一厂的原老板张云乔。他的妻子任风仪,是豪门千金,其父任志清曾任云南巡按史,为蔡锷起草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这对富有传奇经历的夫妻是怎样相依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大半个世纪的呢。

## 战火成就的姻缘

张云乔,今年93岁,早年,他从上海新华艺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电影界。1937年“八一三”,日寇不宣而战,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的电影制作被迫停顿。云乔和当年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带着满腔悲愤,几经跋涉,来到了武汉。他在路上遇见了电通影业公司的同事、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此时她正准备投奔延安。经过陈波儿的介绍,他见到了周恩来。

“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电通公司的人,夏衍和孙师毅都曾经说过你。”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而又关切地询问,“你由上海来,此后有何

打算?”

张云乔和夏衍、孙师毅早在上海电影界就是至交好友。夏衍比张云乔大几岁,云乔敬重他的为人,一直把他当成哥哥和榜样。当时电通公司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联”控制的,拍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优秀革命影片,因此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封杀,被迫关闭。后方的“中电摄影场”和“中制”制片厂则附属国民党,他们曾经邀请张云乔,但遭张拒绝。云乔虽然非常喜欢电影艺术,可是又不甘心当国民党的“大兵”。他在湘汉有些金融界的亲友,于是想转行搞工商业,但又担心……

周恩来听了他的这番苦恼和彷徨后,鼓励他道:“你很有条件向工商界发展。在工商界,同样可以为革命做贡献呀,以后你就通过孙师毅和我们保持联系吧。”(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孙师毅是他的机要秘书)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彷徨中的张云乔看清了自己今后的去向。其实,他是接受了党交给他的的一项特殊任务。他在亲友的帮助下取得了美国道奇和克雷司勒汽车的湖南经理代理权,开办“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并开始了秘密的地下工作。

谁也没想到,搞艺术出身的张云乔又是个商业奇才,他从经营一家汽车进口公司起步,短短的几年时间,竟发展成拥有机械厂、汽车修理厂、卷烟厂等几间工厂的大老板了。

张云乔在贵阳办了一间卷烟厂。这时,任风仪也由于战火纷飞,回家乡避难,耽误了高考。于是,她便在贵阳一间学校任教。这学校恰好就在卷烟厂的附近。

一次,风流倜傥、酷爱艺术的张云乔和朋友一起在贵阳举办画展。就是在这次画展上,任风

仪看了张云乔的画,她惊叹他横溢的才华。而此时,张云乔也被眼前这位清纯美丽的女孩吸引了。就这样,战火无意中为这对才子佳人当了回红娘,浙江才子和贵州佳人千里相会,结下了良缘。

## 周恩来的嘱托

张云乔曾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孙师毅向他转达了周公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云乔记住了这番话。他默默地为党工作。

张云乔的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卷烟厂都成了为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经费的秘密据点。

一次,在重庆的孙师毅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银行汇给张云乔两笔巨款,每次10万。周恩来亲笔附信给孙师毅曰:“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稀即准各十款,并于23号再送十款,以每

决了《救亡日报》的经费问题。

1949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的职工飞行员宣布起义(即两航起义),港英当局采取对策,封锁有关战略物资向国内运送。张云乔在香港开了侨生行,表面上是经营进出口贸易,实际上是与港英当局展开反封锁的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油料、汽车等战略物资运送到内地,为战时战略物资供应立下汗马功劳。

从30年代后期到解放初期,这十多年里张云乔一直是用工商业者的身份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公开斗争,但是在暗地里用自己的智慧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奉献。革命成功了,他没有向党和国家要求什么,仍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默默工作。人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功绩,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廖沫沙1985年在给张云乔的信中说:“《华

郭社是云乔挂与关半径等



油画《血战守小坡》作者:张云乔

上海解放了,上海的福星烟厂和华成大烟厂都曾经想以高价收购广州的卷烟厂,企图把从上海运出的剩余原料制成商品,换成资金,以便逃往国外。当时烟厂有些股东禁不住“高价”的诱惑,犹豫了,但张云乔坚持不肯卖卷烟厂。他说眼看就要解放了,过去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今后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他的意见终于取得了股东们的谅解,保住了这个厂。

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炸了海珠桥,飞出的钢梁砸烂了卷烟厂的屋顶和仓库,张云乔动员全厂职工抢修。工厂刚恢复正常运转,他又和广州民航局长任泊生去香港公私合作经营侨生行,侨生行成为当时国内政府与港英政府进行反禁运的前沿阵地。正当他满怀信心、雄心勃勃地准备挥臂大干时,国内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任泊生成了三反的对象被隔离审查,侨生行也只好停业。为了交代清三反问题,张云乔举家返回广州。

侨生行做的是航空器材、油料、汽车等大宗物资的进口,金钱像流水般从他手中哗哗流过,可是他回国时,银行里却没有一个自己的户头。

当他经过罗湖海关时,香港海关的关员劝他说,国内正在搞运动,你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呀。

张云乔坦然地答:“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妻子风仪也支持丈夫:“不回去难道在外面当白俄呀?!”就这样,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毅然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张云乔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凶猛,就像洪水般扑过来。他偏偏又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弄不明想不通,他感到委屈、痛苦、失望,甚至想到过去死。幸亏和他同甘共苦走过来的妻子理解他,他们一起闯过了这道关口。

1956年,广州工商业界“公私合营”,张云乔高高兴兴地带头参加,他的一中卷烟厂从此改变了所有制,他被安排为私方副厂长。作为私方副厂长,每月工资才500元,但是他还是两次主动要求减工资,最后减到了130元。这时这130元的工资要养活全家6口人。

1964年,他又和广州纺织二厂的荣毅仁、华成烟厂的曹冠英等人把公私合营所得定息捐办

了建联中学。他们只是想尽自己微薄之力,能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可是这片热心肠在文革中竟然被污蔑成“居心不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要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这回他真的伤透了心。

张云乔要求归队电影事业,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设计。曾为《逆风千里》、《故乡情》等影片做过美工设计。在文革中他曾经挨斗、戴高帽、关牛棚。这时,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习惯了运动,因此变得处之泰然了。

文革后,夏衍在《记者生涯的回忆》中提到“当时在桂林以工商界人士身份为党工作的张云乔同志,他的工厂是我们党秘密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联络点。这件事我和孙师毅在解放前是组织上决定绝对保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和红卫兵一再逼供,我也没泄露。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反映张云乔的政治情况,但是1979年冬我到广州问起张的情况,看来珠影厂对他当时所作的贡献,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为此,乘此机会,我向云乔的女儿丽敏要来由她一直珍藏着的周总理两封亲笔短筒,可以证明张在当时担负的工作。”

张云乔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却从未找人为自己证明过什么,更没有把自己曾经为党做的贡献作为资本或砝码,向组织要求过什么索取过什么,他甚至没有向人提起过那段历史。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为党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吧,也许他觉得那只是自己在完成周公的一项嘱托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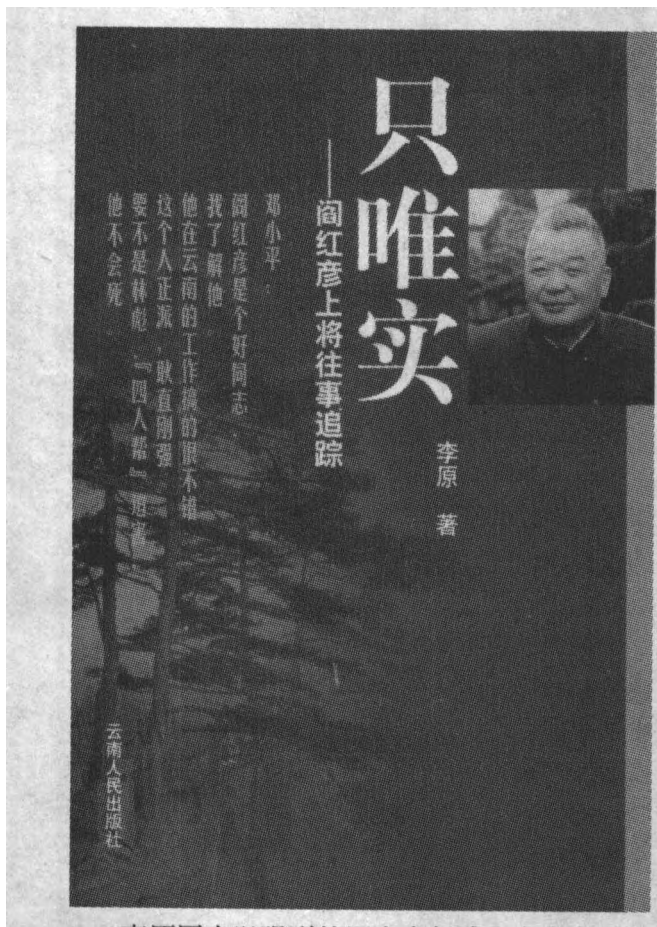
## 陋室度晚年,乐也融融

张老离休了,住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栋老房子里,家里没有当今流行的豪华装修,显得十分简朴。

93岁高龄、百病缠身的张老已经是深居简出了。他每天呆得最多的地方是书房,书房的墙壁上挂着晚年周恩来病重时的相片,这个1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活跃着张老的思想,凝聚着他的情感,有着他的过去和现在,还有他与外面世界的种种沟通和联系。(下转55页)

# 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 盛方仁



李原同志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求实存真的精神，历时7年，八易其稿，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这本书。此书并非遵命之作，也不是有人相约或相求，而是作者靠着当年对阎红彦的深入了解，以及后来对那些充满激清和磨难岁月所作的理性思考，靠着多年的积累和提炼，而逐渐酝酿成熟的。在写作过程中，这位现已年逾80岁的老者，或浮想联翩，或长夜难眠，或感奋不已，或泪流潸潸，最终写下了这三个大字：只唯实。

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昆

明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害致死。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以后，陆续出版了几本阎红彦的传记、专著、纪念文集和他的遗作。李原的《只唯实》，在广泛吸收以往有关阎红彦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些老同志的亲身经历和文字资料、馆存文件、档案材料，进一步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我认为，这本书对阎红彦的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我们从书中看到，阎红彦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坚持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在党内高层斗争中，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于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举报过高岗，保护过邓小平同志。

1945年，高岗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这正是高岗如日中天，党内高层对他的看法相当肯定的时候。阎红彦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诡计多端，伪造个人历史，夸大西北革命历史，说此人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记录存档。阎红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受到高岗和康生的打击，还长期被中央和一些同志误解。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以后，中央终于充分肯定了当年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此后，他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把他叫到身边，当众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这样，中央为阎红彦和高岗之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阎红彦保护过邓小平同志，这件事被认为是阎红彦一生中重大贡献之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受到

严厉批判,有人诬陷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撤退”。阎红彦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十分气愤,当即站起来根据事实进行驳斥,使林彪、江青一伙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康生、江青、陈伯达一起出动,置阎红彦于死地。阎红彦把实事求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只唯实》一书以九章的篇幅记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之死及为其平反昭雪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第二,《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章,涉及的时间跨度达24年之久,问题的实质是阎红彦坚持实事求是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一章首次公开了这部小说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全过程及其真实原因,说明阎红彦对待此书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是同康生有本质区别的。这部小说出版后,中央有关部门、了解西北历史的读者和西北老同志一致认为,它确实存在严重错误。因此,1986年1月中央决定停止发行。这一章还首次公开了胡耀邦总书记为此事所作的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有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这个批示的精神至今仍在指导着党史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见,《只唯实》中的这一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专门有一章记述了阎红彦“只唯实”的一个最大胆的行动,在1962年12月21日的云南省委文件中,明确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而要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搞好生产运动,进行正面教育。迄今为止,这是在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政治运动,西南局又通知要坚决贯彻的情况下,以阎红彦和于一川为主要负责人的云南省委,敢于从云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得到邓小平总

书记的同意和云南广大干部的支持以后所采取的行动。阎红彦说: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 and 稳定。“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如果谁发明人可以不吃,我就天天搞运动。”这份文件发出后,立即受到西南局的严厉追查。之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云南省委不得不做了检查。最后是中央派彭真同志到云南作了实地考察,他肯定了云南的工作,这场风波才算了结。云南的这个文件,被认为是省委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云南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1965年初,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纲领。阎红彦把“二十三条”中正确的东西加以强调,说这个运动“主要是掀起生产高潮”,“运动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对边疆地区,他明确提出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

以上情况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在那个左倾错误日趋严重的年代,阎红彦在贯彻中央批示精神的过程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和抗争,并且取得了成就。

第四,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讲阎红彦在云南,这是因为,阎红彦“只唯实”最成功的实践,集中地表现在他主政云南七年这个时期。从书中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对于关系全局的原则性问题和十分敏感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接上书毛主席。1961年5月,他在弥渡县调查途中,就解散公共食堂等农村六个政策性问题写信提出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扬,从而推动了解散公共食堂、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关系的进程。第二个层面,结合云南实际制定重大的特殊政策,阎红彦往往是请示邓小平并得到同意后才作出决策的。比如,上面讲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又如全面审查和调整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等等。第三个层面,在省委的权限之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恢复发展、照顾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比如,粮食超产部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三三制;养牛养羊主要是看“出栏率”,实行“杀、卖、吃”的政策;养猪实行卖一半,



自己留一半的政策；以及大力倡导开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政策。阎红彦坚定不移地纠正左倾错误，放宽经济政策，“百摇不动”地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群众生活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书中有些章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比如，在剑川县金华公社调查时，路遇肿病死入惨状，阎红彦立即进行了调查。对当地有的领导干部因怕“反右倾”不敢说真话而见死不救、知情不报的作风，他十分震惊，怒不可遏。他要求全省把刹住这股风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肿病死入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大声疾呼：不能一天光唱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不刹住这股风，共产党怎能不失信民心，我们党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

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大跃进”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较快地得到扭转。1962年11月，阎红彦到云南三年，便代表省委宣布，全省生产力已基本恢复，经济调整任务已大体完成，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1964年9月，除粮食和棉布以外，猪肉等几十种

凭票供应的商品在全省全部取消票证、平价敞开供应。1965年，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提出了云南要走自己的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扭成一股绳，来加速民族进步和开发边疆的完整思路和奋斗目标。在云南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话：“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年份之一”，“云南各族人民把阎红彦主持云南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应该说这是贯彻中央经济调整方针和进行政策调整取得的成果，也充分显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威力。

第五，配合书稿的正文，收入了首次编写的《阎红彦年谱简编》，再加上两篇序言和附录的八篇文章、一组诗词，使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整地系统地多角度地反映阎红彦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它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阎红彦的贡献、人品和留下的精神财富提供了丰富的客观的历史资料。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阎红彦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只唯实》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很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 李晨)

## 王森然先生轶事二则

● 李郁秀

已故全国政协委员王森然，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史学家，晚年又成了国画家。上世纪20年代末他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时，做了不少好事。现叙两则，以飨读者。

(一)1928年春，王森然以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之职，兼任设在中山公园内的北平革命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管着中山公园的日常事务。上班第一天，他按时来到中山公园西门，进门时，收票员不认识他，跟他要票，他就买了一张票进门。随后，一位公园的职员来到门口，看到王森然的背影，对收票老头说：“他是新来的馆长，你跟他要票，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收票老头一听，吓坏了，不知所措，还是这位职员给老头出了个主意，让他快点找王馆长认错。收票老头快步来到办公室，看到王森然正在铺纸要写什么。老头上前，一边鞠躬一边说：“馆长我不认识您

……”不等老头说完，王森然笑着说：“你做得对，我正要写布告表彰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赶忙说：“别介，这是怎么说呢？您不怪罪我，我就念弥陀佛了。”随后说出自己的名字。王森然当即写了布告，让一位职员贴在公园门口。布告云：×××收票认真、严格，难能可贵，特奖大洋四元，以资鼓励。

(二)1929年11月，王森然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兼管北平儿童救济院。王森然到任后得知，救济院毕业的女学生多半去当妓女，对此他深恶痛绝，决心改变这一社会弊端。

一天，王森然路过西直门，看到巡警对妇女进行搜身检查，忽然想到：如果让救济院的女学生当巡警，专职搜查妇女，这不既革除了男巡警对妇女搜身的陋规，又为救济院的女学生找到了生活出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于是，王森然把这个大胆的想法上报了市政府当局，并得到批准。

1930年5月，王森然把30多个当年救济院毕业的女学生送到警察局，当上了巡警。同年7月，北平的各城门脸儿出现了女巡警值勤、盘查过往妇女的新鲜事儿，不少人专程跑去看稀罕。



# 忆小高——《大公报》的高集

● 李 普

6月1日下午,我接到高汾的电话,说高集凌晨走了。

我们相交60多年,一直以小高小李相称,到老不变。现在写下“小高”这两个字,我不禁热泪盈眶。

近几年,小高的身体一直不好,先是心脏装了起搏器。他打电话向我取经,因为我是早已装了起搏器的,但是他早年肺部开过刀,身体比我差。他后来胃大出血,最糟糕的是脑血管软化,记忆力迅速下降,可以说身体的关键器官都出了问题。尽管如此,半年多前,他还是由老伴高汾保护着来到我家。他确实很衰弱了,拄着拐棍,走路也不稳当,耳聋眼花,几乎不怎么说话。比我去年到他家,他好像突然老了,我看了很难受。前不久,我打电话给高汾,请他们全家来再聚一聚。我的潜台词是,都是80多岁的人,聚一次,多一次了,我不愿说那种“少一次”的丧气话。但是高汾坚决拒绝,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小高身体不行。我理解她的心情,只好说过一阵再说。我确实不认为有那么严重,确实认为小高会慢慢康复一些的。

没想到小高这么快就走了,没想到他来我家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面。

6月3日,我赶到高集家吊唁。他原来的卧室兼书房已布置成灵堂,桌上、地上摆满了花篮。墙上的遗像表情有些凝重,还像平时一样看着我,我的眼泪忍不住涌了上来。我拉着高汾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傻话,他是我的好朋友,重庆那几年我们天天在一起。

我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相识的。我们三个好朋友常常一起跑新闻。我们都是跑外勤的记者:我在《新华日报》,小高在《大公报》,还有一个是我们叫他·维廉牡张的张维冷在《新蜀报》。《大公报》对国民党蒋介石小骂大帮忙,而且确实办得不错,在征订各报中位居第一。中共的《新华日报》叫许多人爱,叫另一些人恨而且怕。因为爱《新华日报》的人往往不便于公开表露,

而对《大公报》记者,人们却不好拒而不见。所以我们三人一同采访,总是先由高集亮出名片来,进了门,我们再各自掏自己的名片。后来陈翰伯也从成都来了,在《时事新报》当采访部主任。我们四个就成了好朋友。翰伯的夫人卢琼英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因为当时只有他俩成了家,开头我们有时就到他们家吃饭;不过他们家也很穷,后来我们就常常在外面下小馆子。《大公报》薪水高,我们这几个朋友唯小高有钱,当然每次都由他付账,现在叫“买单”。

跟他们交游,我常常觉得受益不浅。陈翰伯燕大毕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西安事变时期,他在事变领导者张学良将军所办的《西京日报》当总编辑,那时22岁。张维冷曾经留学日本,高集是西北联大毕业来重庆的。我认为他们都比我有学问。有一段时间,小高、维冷和我三人,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报馆上夜班,恰巧又都是编国际版。这就好像是我们三个好朋友之间的友谊比赛,各出招术、各显神通。有时候我沾沾自喜,有时候确实自愧不如。我们《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我记得我们报馆另一位夜班编辑、北师大出身的杨赓,有一天就嘻嘻哈哈对我说,小李,今天不妙了,你输给你那两个好朋友了。那天他起身比我早,先看了报。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我禁不住掉眼泪。我们,多么好的朋友,多么亲密的兄弟!

我和小高到达重庆和最后离开重庆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我到重庆是1939年冬天,小高是第二年夏天。他是1946年4月离开的,比我晚两三个月。他的姑父是大名鼎鼎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他当记者,恐怕是受了他姑父的影响。

小高常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去,同徐冰、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很熟,周恩来也很器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地下党员,其实那时他还不是。我知道

周恩来常常给他一些任务,叫他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做一些工作。

小高也是《新华日报》的常客。同我们报馆的刘述舟、鲁明,还有胡绳、吴全衡夫妇都很熟。他比我小两岁,热情诚恳,口才好,会讲笑话。还有一项本事,“见面熟”,第一次见面的人就好像老朋友一样。他是陕西人,有一次学山东潍县人说话,比如“炒鸡丝”,说“炒”和“丝”这两个字的时候,把舌头夹在上下牙齿中间,引得大家大笑。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活的,生活很紧张、很充实。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纲领,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甚至生活内容。我们做的是这些事,日常思考的和谈论的也是这些事。这斗争虽然很困难,有曲折,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胜,干劲大、热情高、精神振奋。这方面,小高和我们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之间无所不谈,而且一起行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紧反共,国共两党有分裂的危险,国民党有大下毒手的可能。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采取疏散隐蔽的方针。留下少数人在重庆坚持工作,大多数分头隐蔽。《新华日报》的同志在组织的安排下陆续离开重庆,有的到香港,有的到桂林。我经贵阳到了昆明,又转到内迁大理的华中大学,隐蔽了一年。后来我听说,小高利用《大公报》这块牌子,送走了好几个人。

1942年夏天,政治形势好转,接到报社的通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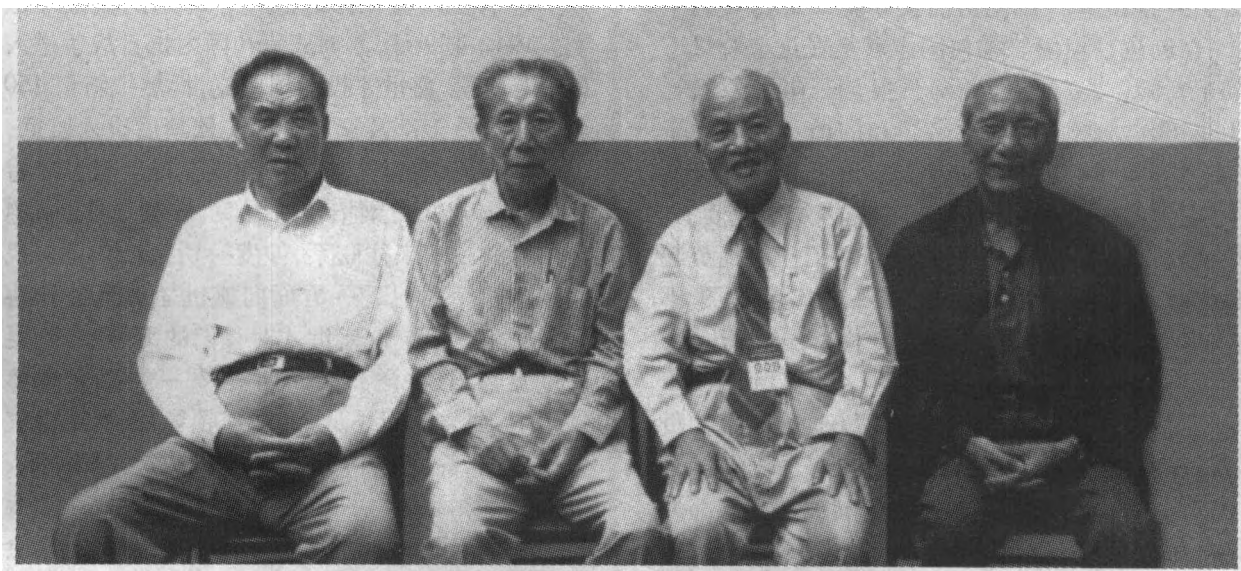
又回到重庆,又见到了包括小高在内的许多老朋友。我离开的这一段,小高坚持在重庆帮助党做工作。他利用《大公报》的关系,经常给转移到香港、桂林的同志们写信,报告重庆的情况,也把外面同志的信件转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这段时间里,小高还参与办起了一份杂志。原来,“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进步杂志都被迫停刊。形势比较平稳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意恢复一本杂志,扩大党的影响,就让高集出面,请沈钧儒帮忙,由读书出版社出一本叫《学习生活》的杂志。他当责任编委,实际就是主编。编委有戈宝权、孔罗荪、陈翰伯、张维冷、鲁明等人。他一再推辞,推不掉。我听不少同志说起,小高对这本杂志很上心,到处约稿。他自己在每期杂志上都写一篇文章,也写别的东西,有时一期好几篇,忙得够呛。但是,这本杂志的寿命也不长,大约几个月,国民党就把它封了。

全国解放以后,小高一直在《人民日报》,我曾换过几个单位,1960年我到了设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小高来过广州一次,见面十分高兴,但是接触的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我1972年回到北京,并且回归了新闻队伍。我的老伴沈容、小高的老伴高汾,都是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两家往来比过去更密切。在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们个人都有过顺境,也有过不该有的逆境。但无论怎样,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来没有中断。

现在,“小高”走了,“小李”挥泪写下这篇短文,为小高送行。亲爱的小高,我的好朋友、好兄弟,祝你一路走好!

(2003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老友相聚,右1是李普,左2是高集

# 永久的青年——怀念李何

● 瞿独伊

李何同志在建国初期曾任新华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后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副主任。他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州，自幼随父亲到广东汕头读书。1933年，他15岁中学毕业，到厦门大学念了一年进修班，接着考进厦门大学。在校内他开始接触进步同学，并秘密参加共青团组织，从事进步活动。后因身份暴露，反动派要逮捕他，即转往广州中山大学继续读书。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参加海关救亡长征团，辗转广州、香港、武汉等地作演讲宣传。1938年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从武汉长途跋涉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入了党，并在抗大学习了半年，当年冬天，受党的派遣到新疆工作。

抗战前，盛世才趁新疆军阀处于混乱时，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成了“新疆王”。在抗战高潮时，盛世才伪装进步，实行亲共、亲苏的六大政策，我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其请求，派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前去新疆，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建设新疆。李何同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了新疆，被分配到《新疆日报》任国际版编辑。为了工作方便，他取原名履和的谐音改名为李何。当时，报社只有五六个党员和几位当地工作人员，熟悉业务的干部不多。李何因从小爱读书，中文程度也不错，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便担负起许多社论文章的撰写，用“小黎”的笔名，写了不少国际评论，特别是“短评”专栏，一连十几天，天天都有李何写的文章。从1942年元旦到7月7日，李何一人就发表了41篇文章。据当时报社负责人李宗林回忆，李何是最用功的，工作做得最多的同志，他几乎负责写了50%的社论和大部分国际版的稿件。他星期天从来不休息，有一次报社请一位同志赶一篇社论，那位同志想去玩不愿

写，李何说：我不休息，我来写。这样又赶写了一篇社论。他常常连坐几个小时不离开桌子，一口气写完一篇稿子是常事。

李何在《新疆日报》工作期间，一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他平时不多言谈，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学到深夜。李何和报社的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关心他们，常常和一些进步青年谈心，主张多读书，多写文章。他说：“书籍宛如把我们从小溪漩涡中带向广阔生活海洋的船舶，只有博览群书，才能领略知识海洋的无限风光。”李何非常重视和少数民族交朋友，从政治上、业务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维吾尔族编辑维古尔·沙依然、黎·穆塔里甫，都得到过李何的具体帮助。他们在编辑或翻译稿件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一些人名、地点、名词术语等不明白，都乐意向李何请教。李何总是有问必答，态度耐心。

李何在新疆工作近四年，却遇到盛世才叛变。1942年9月，苏德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盛世才投向国民党，悍然把新疆150名中共党员干部及家属全部先软禁后投入监狱，也包括李何、我母亲杨之华和我在内。盛世才将我们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大院，软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联系，停发一切报纸杂志。我们利用这个时机，一方面向盛世才展开公开斗争，联名写信抗议盛世才对我们的无理软禁，要求恢复自由，并送我们回延安；另一方面暗中整顿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加强领导，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准备长期斗争。学委会的成员是陈潭秋、毛泽民、徐孟秋、潘同、刘西屏（徐、潘、刘后叛变）。9月1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后，学委会成员改由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李何、谢良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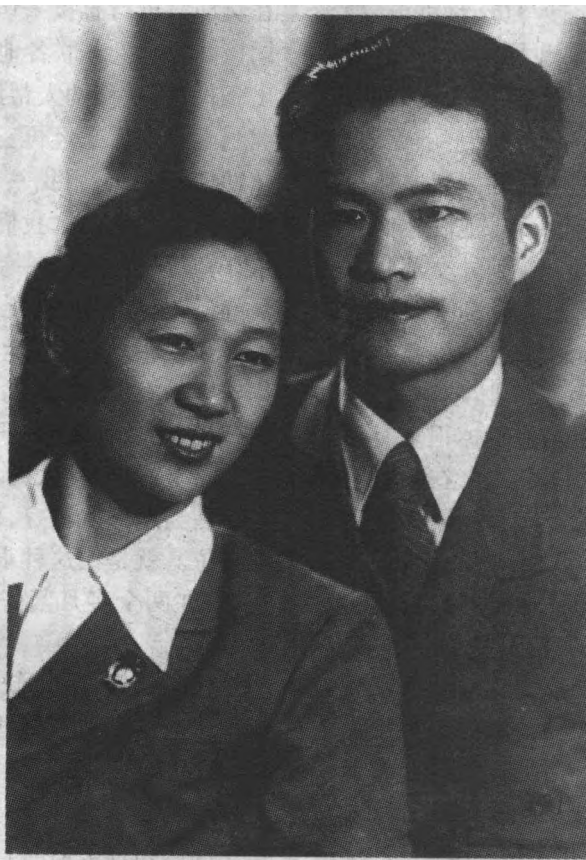
任。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但不管形势怎样恶化,斗争如何残酷,大家都要保持坚贞气节。

我和李何是在新疆认识,被捕软禁期间彼此了解更深,因而结婚的。李何知道我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学习中文水平差,所以在结婚第二天早晨就教我读范文澜写的中国历史书,帮我学习中国历史,提高中文水平。

1943年春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甘肃、新疆边界增兵,甚至把部队开进新疆,大批国民党特务渗入盛世才的政府、军队、学校各个部门。盛世才撕下最后一道假面具,公然下令逮捕中共在新疆全体人员。4月11日他派公安局副局长带领军警来到八户梁招待所抓人。一些女同志责问军警:你们凭什么来抓人?不少同志是应盛世才的要求来新疆工作,为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为什么要遭到你们的虐待和逮捕,是何道理?当时,我妈妈杨之华紧紧拉住李何,嘱咐他被捕后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双方相持了一阵后,男同志被强行推上几辆卡车拉走了,不久,所有的女同志也被捕入狱。

李何被关押在一监狱,和吉合、杨南桂同在二号牢房。

1943年6月份,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在“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向盛世才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抗议信是李何起草的。据方志纯后来回忆说:“李何同志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我们当时的‘大秀才’、‘宣传部长’,我们狱中一些重要的文字工作都是他搞的。他写的抗议信简直就是一篇很好的讨盛檄文。控诉的地方义正辞严,呼吁的地方真诚恳切,抗议的地方理直气壮,提要



李何和瞿独伊摄于1950年

求的地方合情合理。”当时在狱中设法弄到几份报纸,党组织便委托李何根据报上的消息写成时事报道和分析文章,并用蝇头小楷抄在纸条上或书本空隙中相互传递,帮助同志们了解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对敌斗争策略,鼓舞斗志。记得我们女牢也曾接到过这样的纸条。

1945年“七·一”,李何为纪念党的生日写了一首诗《母亲》,表达思念之情:

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我们的梦魂,夜夜飞度天山,回到你的身旁;你的音容,时时透过狱墙,落在我们的心坎。是你的讯息,加强我们胜利的信心,是你的乳汁,哺养我们无穷的力量。牢狱——僵死不了我们的思想,黑号——钝化不了我们的眼光,镣铐——打不烂我们的硬骨头,吆喝——压制不了我们的怒吼,饥饿——改变不了我们的心肠。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总有一天:黑暗到了尽头,屠场被踩平,囚笼被打碎;我们奋起自由的羽翼,冲向光明的天空,投到你的怀抱!

在男监,我们的同志有组织地进行过三次绝食斗争,李何于1961年写了一篇回忆在新疆监狱中第三次集体绝食的文章《一心向着党》,记述了这次斗争的情况。

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四年,终于于1946年6月获释。党中央委托张治中把这批新疆工作的同志送回延安,李何和我便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来随部队进入北京,除了忙于业务工作外,他还兼做团的工作,并曾出席过全国第一次团代会。

1950年3月,李何和我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我们的工作是从北京赴莫斯科的旅途中就开始了。3月12日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为了使每个选民都有投票机会,

苏联在列车上也设了投票箱,我们便采访了列车上去莫斯科的旅客,请他们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完成了我们从国外发回的第一篇新闻。

到莫斯科后,我们按总社领导的指示,以介绍苏联人民生活、苏联经济建设的具体经验为主,同时要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翻译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权威性理论文章。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困难,主要是苏联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莫斯科周围50公里以内,一切对苏联人的采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

在莫斯科工作第二大困难就是向国内发稿难。首先是发稿费用高。其次我们向国内发电讯还要经过这样的手续:先由大使馆译电员把所发消息译成电码,然后用打字机把电码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内容译成俄文。这样一来,一条电讯常常几个钟头都无法发出,很难保证时效。

从莫斯科给国内打长途电话,1分钟14卢布,要先立户存美元,通话内容事先用俄文写出备考,这是当时苏联新闻检查制度的规定。

莫斯科记者站编制有限,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计、炊事员、采购员,各种零七八碎的琐事,无分散我们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刚好赶上天下大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路,到他那里后,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他说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发室即可。当得知我们既没有车子又没有通讯员时,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向他解释:“中国目前厉行节约,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设上。”他说这些情况 he 也知道,只是可惜我们要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不仅在工作中注意节约,在生活上也同样要求自己简朴,在给我们定薪时,李何主动减去400卢布,我也减掉700卢布。当时,记者站用于工作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都是我们自费购置的。我生病住医院的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三四倍,但我们都没有向公家报销。我后来离开记者站去学校学习,有几次用公家的小车接我回家,李何都一一交汽油费。在国外工作期间,李何所得的稿费绝大部分是交党费。李何在分社工作期间,还义务兼任《人民日报》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开

展起来。李何的俄语是在新疆监狱自学的,阅读报刊还可以,口语和听力差。但他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所以,编写稿子都是他的事。我则相反,俄语好,中文水平太差,又没有搞新闻工作经验,所以只能给李何当助手。外出采访,我给他当翻译;去列宁图书馆查资料,也是我摘下原文,回家后口译给李何,他记录下来,然后再编成稿子发回总社。

李何写起文章来,往往是先准备好材料,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一气呵成,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桌旁,忘了喝水,忘了吃饭。记得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到40℃,当时家里没有别人,李何给我递上暖壶,拿毛巾帮我擦擦汗,便又去赶写文章。既不留下来照顾,又忘了去叫医生。李何对自己的健康更不注意,他19岁时就得了心脏病,早在新疆工作时候,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就讲过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做新闻工作,不能太劳累。可是,他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这种要求,仍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

1952年5月,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进行直接采访非常困难,我们争取到陪同该团一起到苏联各地参观的机会。但代表团提出条件,要我们两人帮助他们工作,李何当秘书,我当翻译。后来经再三协商,该团同意主要由我帮助他们工作,用我一个人的劳动换取两个人随该团参观的机会。我们随团到库班、克拉斯诺达尔、阿塞拜疆等南方一带访问。代表团成员参观,我翻译,李何仔细记录。代表团休息,他写报道。当时天气很热,温度达39℃左右,列车车厢内闷热异常,李何为了赶写通讯,在车站找个地方坐在砖头上,用膝盖当桌子便写起来。有一次,在一个小站上,他因为太劳累而晕倒。代表团团长要他留在当地医院治疗,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工作岗位。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以战斗的姿态,在两个多月紧张的访问中,发回了十多篇通讯。

建国初期,我们缺少俄文翻译,所以国内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我去当翻译。如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农民代表团,甚至周总理访苏、中国驻苏使馆张闻天大使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要让我给他们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原来的工作也要他承担,生活上我

更丝毫帮不了他,搞得李何非常辛苦。有一次,他对我诉苦:“独伊,你走了,我连饭都吃不上。”我这样频繁被借出工作,李何原已沉重的工作量就更加重了,我常常感到不安。

工作虽然辛苦,但取得的成绩令我们欣慰。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盛典,为了充分反映当时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李何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翻遍了列宁图书馆的报刊及有关资料,采访了曾到过新中国的第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由于我们的辛勤工作,这一时期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后来,我们发回总社的许多特写、通讯、综合报道等,在国内被广泛采用,总社也来信称赞我们:“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的。”

李何同志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先是作为新华社的特派记者,1954年后又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时,他可以直接和《真理报》联系,因此采访就方便多了。在这期间,他几乎跑遍了苏联各地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大的工厂、集体农庄、学校等,写出了数十篇通讯和报道,并因此得到过中宣部的通报表扬。这些通讯后来还汇编成三个集子。李何同志因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出色成就,在1956年还被选为代表,光荣地出席过党的“八大”。

1958年春,李何奉调回《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副主任,分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报道工作,他也亲自动手写了不少宣传党的对外政策的评论文章。

李何在工作之余,空闲时间几乎都用在在学习上。他喜爱的领域很广,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史,无所不好。他在新疆监狱里用原文版的“联共党史”和中文版的“联共党史”对照看,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反复琢磨自学俄文。

同李何同志相处的同志,一致认为他身上有许多突出的优秀品质:无论在工作中、在监狱里、在病床上,都一贯顽强工作,刻苦学习,克己奉公,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热爱;他为人正派,充满革命正气,坦白直爽;对组织,不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十分尊重;无论驻外也

好,在机关也好,非常注意请示汇报,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

李何回国后,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关于新疆监狱的回忆录,但没有充足的时间,常常是挤一点、凑一点的时间,生前竟写了将近10万字的草稿,尚未来得及写完,他就去世了。“文革”时,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达10年之久,这手稿和他在国外写的其他一大箱文稿手迹,全部被抢劫走了。这是他多年的心血,竟毁于一旦,多么痛心可惜!

李何年轻时患过白喉,得了后遗症心脏病,在新疆监狱的艰苦生活又使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再加上长期工作中不顾身体辛劳过度,经常加班加点赶写文章,使他的心脏病急剧恶化,终于不治,于1962年8月5日病逝,终年44岁。他正在壮年有为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首都新闻界为李何同志举行了少有隆重的追悼会,由吴冷西同志主持,胡绩伟同志致悼词,王莫同志讲述了李何在新疆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参加追悼会的人坐满了人民日报社的大厅和大厅外屋。

李何病故的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后,许多朋友、同事、战友来看望我,表示哀悼。当时儿子也患不治之症,他的生命也维持不久了!这一切使我悲痛欲绝。来看望我的新疆监狱战友于村对我说:“独伊,你不要太悲伤,李何同志虽然只有44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生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你应以此来安慰自己。”战友们的这些话极大地慰藉了我,帮助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战友们对他的工作的评价也鼓励了我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他工作起来的确像一团火。不怕艰苦,不知疲倦,也不顾身体,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干、干。虽然他去世已41年,但他忘我工作的形象和精神还常显现在我的眼前,也鼓舞了我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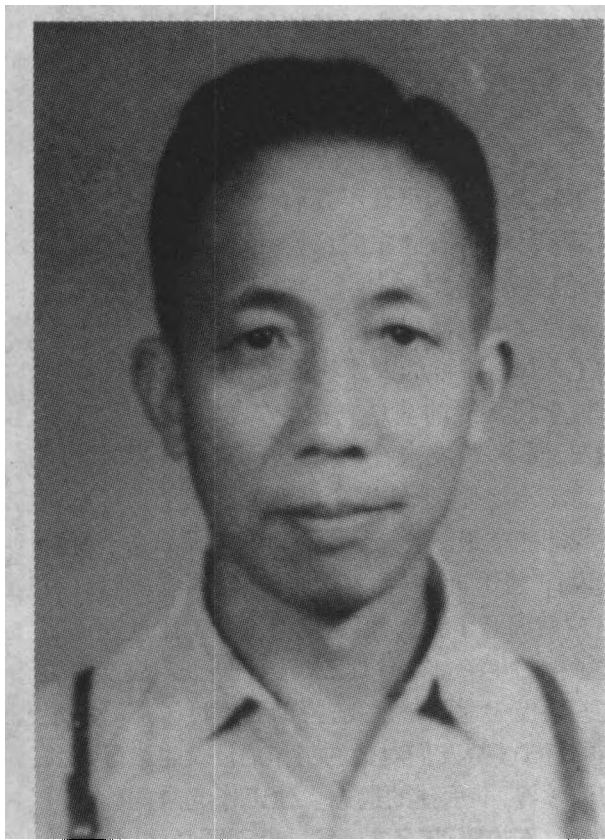
我想用我父亲瞿秋白在“儿时”中写的话来结束我的回忆:“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面,假使他天天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李何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永久的青年!

(责任编辑 李晨)



# 《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

●刘大明



桂涛声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恢宏的气魄，坚决的意志，唱遍了祖国大地。

这首歌的曲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冼星海，词作者桂涛声却鲜为人知。

桂涛声，原是抗战前由李公朴创办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救亡活动。因我这时也在该社工作，所以我们得以经常相处。他对人平和，热情，社里同仁都以“阿桂”称呼他。

阿桂，云南人，1903年3月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回族，1918年毕业于沾益县高小。1919—1926年先后肄业于云南省立第三师范、云南省立美专绘画科。在美专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第一次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广东韶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任参谋处书记员，并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阿桂在上海工作。因在他宿舍中搜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而被捕，判刑5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时一起被关的有：曹荻秋、彭康、黄洛峰、吴黎平、徐君曼等。被关5年后，阿桂又被解到苏州反省院关押1年，终于在1937年2月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刚刚出狱不久的李公朴决定前去华北前线劳军，阿桂随行，阅二月任务完成，又随同李到达武汉。

阿桂到达武汉时，适逢汉口文化界发起为在平型关取得抗战开始以来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大捷的八路军募捐棉衣。两个来月的前线劳军，阿桂亲身体验了前方将士的英勇艰辛，值此募捐活动，当即触发了他以民歌的形式写了一首情感深厚的《做棉衣》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很快在武汉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老干部高唱抗战歌曲

群众中传唱开来。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上海“八一三”抗战末期,上海守军一部即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部 800 人(实为 400 多人),孤军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一誓死不屈的壮举,很快得到了上海数百万人和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尊敬,也感染了阿桂像火一样燃烧着的心,当即写下了《歌八百壮士》一首。“中国不会亡”的强音,不知使多少民众从迷雾中奋起,坚定地投入抗战洪流里。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  
不退让  
宁愿死  
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  
国中飘荡……

阿桂这时非常忙碌:要出席救亡团体会议,应邀到一些单位讲演“游击战争”,最使他心潮起伏的是他在太行山将近半年的感受:他见到了敌骑深入祖国内地,他见到了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更见到了在敌

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使他得到了力量……于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一下子从心底迸发了出来。阿桂在誊抄这首歌词,将要寄给冼星海时,我正好在他旁边,因此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大概半月后,阿桂把冼星海谱好了曲的《在太行山上》歌篇给了我,并说:“唱吧!”我不由得照着歌谱哼了起来。不久《在太行山上》广泛地传唱起来。直到今天!

后来我在太行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工作 9 年,直至全国解放前夕,均不知阿桂下落。上海解放后始知他在上海复兴中学任教,知道了他于 1940 年在济源四十七师工作时,竟失去了党组织的关系,并已离开了部队,先后在西安、洛阳等地的学校教书。据说在西安时,有人“劝说”他把《在太行山上》一曲的某些词句作一改动,但他一口拒绝,一字不动。抗战胜利后,他到了上海,在复兴、育才等中学继续任教。上世纪 70 年代,他曾到北京访友,我陪他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等处,这时他年事已高,言谈举止均已略显迟钝。1982 年 12 月 16 日,他在上海育才中学病逝,享年 80 岁,学校以回族习俗礼葬了他。

今年恰是桂涛声百岁诞辰,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留给我们的多首歌,将长传不竭。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华侨歌唱家黄源尹的坎坷人生

● 梅门造

爱国华侨歌唱家黄源尹,1921年12月29日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由于生就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从小就喜爱唱歌,经常拿着吉他自弹自唱。他6岁进入棉兰敦本小学,10岁转入苏东中学。13岁时父亲将他送回祖籍福建读书,先在厦门同文中学上学,后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6岁的黄源尹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目睹了日寇对我国同胞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举目无亲的他,不得已随一批南洋归侨学生一同回到侨居地。

回到印尼,黄源尹在棉兰苏东中学附小教音乐课,并成立学生合唱团宣传抗日救亡。大哥源昌认为弟弟具有歌唱天赋,应该朝音乐方面发展,就让他跟随正在棉兰讲学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波德威学唱。由于他勤学苦练,学业大进,一年后便在棉兰举行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引起轰动,时年仅17岁。

1939年,小号演奏家夏之秋率领武汉合唱团赴南洋各地进行抗战救亡募捐演出,黄源尹获知后,只身从棉兰跑到吉隆坡,要求加入合唱团回国抗战。夏之秋被这位爱国青年华侨的行动所感动,在听了黄源尹的歌唱之后,认为他是个很有潜质的歌唱人才,便同意其加入合唱团。当时南洋一带看过武汉合唱团演出要求加入者为数不少,都被夏之秋婉言拒绝了,黄源尹是唯一的例外。

这时,夏之秋刚好完成独唱曲《思乡曲》的创作,他拿给黄源尹试唱,让夏之秋惊喜的是由于黄源尹的再创作,将这首短短四个乐句的歌曲,演绎得十分精彩。《思乡曲》很快便在海内外流传开来,成为海外游子思念故乡、抒发胸臆不可多得的佳作。

随后,他满怀爱国热情随夏之秋等取道缅甸、云南回到重庆。这次回国一路行程十分艰难,在富裕家庭生长的黄源尹没有一点怨言。在路经云南大理时,黄源尹遇见了爱国实业家周苍柏及夫人董燕梁,当时他们的长女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正在巴黎学习声乐,儿子周德佑在抗战宣传中积劳成疾去世。周苍柏是个爱才的人,加上黄源尹与周德佑的面貌性格有几分相似,很得周家的喜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黄源尹称呼周苍柏、董燕梁为“爸爸”、“妈妈”,对周家子女就以兄弟姐妹相称,称周小燕为“二姐”,周家称他“小黄”,由于黄源尹面色黝黑,又亲昵地称他“小黑炭”,亲如一家。

回到重庆,黄源尹住在周家。这时,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招生,一心想学声乐的黄源尹前去报考。主考官听完黄源尹的演唱后,惊讶不已地说:“你唱得这样好,别学了,你来教吧!”考生一下变成了教官,在当时乐坛传为佳话。而黄源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半年的“音干班”教官经历,竟使他背了一辈子的历史政治包袱,成了他坎坷一生的祸根。

黄源尹梦寐以求的还是学习声乐,在周苍柏夫妇的支持下,

1942年8月，他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在俄罗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谢利万诺娃教授的指导下，黄源尹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斐然。当时，声乐专业是四年学制，由于黄源尹学业优异，只学了二年半，校方特许他提前毕业，这在该校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纪录。

毕业后，黄源尹兼任上海音乐协会理事，积极活跃在音乐舞台上，他多次举办独唱会，并参与上海音协组织的各种公演和义演，成了上海滩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这一时期与他同台演出的人，至今仍是耳熟能详的音乐家，如李德伦、黄飞然、楼乾贵、郎毓秀、马思宏等。黄源尹性格开朗，以诚待人，在文艺界有许多好朋友，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如周璇、陈娟娟、王人美、王丹凤等都曾先后随他学习唱歌。

黄源尹还到南京、重庆、武汉等许多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抗战胜利后，他在汉口曾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联袂举行独唱音乐会。1946年黄源尹参与了在汉口璇宫饭店为国共停战谈判代表团举行的专场音乐会。三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出席欣赏。那晚，黄源尹用原文唱了一组外国歌剧咏叹调，还有一组中国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康定情歌》等，他那漂亮的歌声和精湛的演绎，受到三方代表的高度赞赏。马歇尔惊异地说：“真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么漂亮的抒情男高音。”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常到周苍柏家约见爱国民主人士，在那里他曾多次听过住在周家的“小黑炭”的演唱，他夸赞这些年黄源尹又有了新的进步。张治中将军盛情邀请黄源尹到大西北去巡回演出。不久，黄源尹就以上海音乐协会的名义，联合吴乐懿、周小燕、马思宏、马思荪、陈丽清等人，远赴甘肃、青海等地巡回演出、考察。同行的几个音乐家因水土不服而在兰州止步，黄源尹却开着一辆张治中将军特批的军用吉普车，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足迹，西去西宁古城，攀上日月山。此行对黄源尹的歌唱事业影响深远，他第一次感受到大西北的风土人情，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民歌，给歌唱家增添了不少灵感和激情。在青海湖畔他与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相逢，王洛宾以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相赠。从此在黄源尹的保

留节目单上，便有了这首朴实而动人的情歌。

1947年，在爱国侨领陈嘉庚资助下，黄源尹和吴乐懿、马思宏三人，赴南洋巡回演出，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檳城、马六甲等地举行募捐义演。这年8月，周小燕从巴黎学成回国，途经新加坡时遇见了黄源尹。周小燕听了黄源尹的演唱，赞赏不已。多年之后，她回忆那次聚会时，仍对黄的歌唱艺术赞不绝口：“他的嗓音是那么柔美，那么富有感情。他的演唱使我惊讶，不仅声区统一，气息运用自如，而且吐字非常清晰准确，传情达意，生动细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9年1月，黄源尹到了香港，应聘为九龙窝打老基督教青年会音乐部顾问，并在香港中华音乐学院、璇宫圣乐学院担任声乐教授。他常在香港大酒店的礼堂演唱，曲目主要是中国民歌，也用原文演唱一些意、德、俄、英国民歌和艺术歌曲，极受欢迎。1950年黄源尹收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任教聘请书，正当他准备赴英之际，突然收到“二姐”周小燕的来信，要他回来为新中



黄源尹



1948  
年黄源尹  
在香港举  
办独唱音  
乐会

国工作。在费彝民、夏衍、乔冠华等的动员和帮助下，黄源尹不顾印尼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去英伦教学，而选择了北上回国，当年11月黄源尹怀着满腔爱国之心回到上海。

在上海，黄源尹在周小燕为团长的上海音乐工作团任音乐指导。他热情地投入工作，除了经常上街、下厂演出之外，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黄源尹性格开朗，乐观风趣，乐于助人，与大家相处很好。翌年，他被调到苏州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革命理论，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

当时新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黄源尹任劳任怨，工作积极，努力向民族民间学习。他的足迹走遍天山南北，他的歌声响遍喀拉昆仑，在新疆谁都知道军区文工团有个唱歌很棒的黄源尹。他的名字很快传到了北京，并被调到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兼声乐教员。黄源尹为自己能在解放军最高艺术团体工作，感到非常荣幸，他全心全意投入演出和教学，经常随团深入全国各地为驻军和地方演唱，官兵们都很欣赏他的演唱，同志们都很喜欢这位黄教员。

1953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来访，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排练了中国民歌《康定情歌》，特别邀请黄源尹担任领唱。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开幕式上，黄源尹与百余人的红旗歌舞团的男声合唱团珠联璧合的演出，博得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

这年秋天，黄源尹随贺龙元帅率领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的条件下，黄源尹勤勤恳恳工作，他不但歌唱得好，而且演出作风好。从平壤到38线附近的前沿阵地，他给领导机关首长演唱，也给坑道里的士兵演唱。他甚至给因担任值勤而没有看上“祖国慰问团”演出的一个战士，作过单独演出。

从朝鲜回国后，黄源尹除参加外事和国事演出，担任歌舞团的声乐教学外，还试唱了许多新歌，如瞿希贤的《拂晓的灯光》、秦西弦的《我爱草原、我爱海洋》等。特别是他首唱的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改编的《牧歌》，影响最大。这首歌只有短短四句歌词：

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  
白云的下边盖着雪白的羊群。  
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  
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

黄源尹的演唱把它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业内人士惊叹：“此乃天籁之声，至今尚无第二人能达此一境地也！”经由黄源尹首唱和别出心裁地诠释后，瞿希贤的《牧歌》，或以男高音独唱形式，或以无伴奏合唱形式，广为流传，成了音乐会上展示男高音与合唱团演唱水平的“试金石”，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

就在这时，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总政歌剧团，有一些演员慕名向黄源尹求教，有一位从朝鲜回国后考入歌剧团的原志愿军女战士余启英，



学习最勤奋,人长的漂亮大方,深得黄源尹赏识,他们很快便双双堕入爱河。不久,“肃反运动”开始,黄源尹被隔离审查,而余启英也被以工作需要为由,调离北京,远赴西藏拉萨。这时他们只能以鸿雁传书来表示相互的倾慕和思念。一年后,余启英得到歌剧团领导的正式信函:“黄源尹问题”已经查清,组织上同意你们的恋爱关系。随即将余启英调回北京。1957年5月11日,他们终于结为夫妻。

婚后第三天,黄源尹便随团到部队演出去了,余启英依然回到歌剧团工作。不久,“整风”运动开始,《文艺报》开辟了《让歌唱家演奏家鸣起来吧》专栏,邀请首都著名音乐家“座谈”、“鸣放”,黄源尹也在“邀请”之列。他在会上没有说什么,会后有位记者追到家里来“独家采访”,据余启英回忆,就在他们那间还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里,在记者的“启发”下,黄源尹说:“自己是歌唱演员,希望能多演出,并希望有机会灌录唱片”等。这次采访内容很快便在该专栏刊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内容被“巧妙地”篡改了,成为黄源尹“不满现实”的“右派”言论,顷刻间“深入揭发”的大、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批判声讨”的大会小会接踵而至,黄源尹被划为“右派”,连降4级工资,剥夺歌唱权利,被迫脱去军装,即刻调离北京。

1958年深秋,黄源尹和余启英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小钧,登上西去的列车,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黄源尹虽然被列入另册,但他心怀依然坦荡,工作依然积极,随团深入农牧区,认真向民族民间学习,并收集记录整理和研究青海民歌,他讪笑自己“因祸得福”被发配到“民歌的海洋”、“生活的宝库”里来了。这对他以后演唱西北民歌有很大的帮助。1959年冬,团里排演歌剧《春雷》,黄源尹被分配饰演一个地主,他没有怨言,演得很认真。

黄源尹的遭遇很快传到港澳、南洋一带,国外的亲友多次来信劝他出国,几个国外的音乐团体也邀请他去演出。但是,忠心耿耿为祖国声乐艺术献身的黄源尹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了。

1962年黄源尹的问题经过甄别平反,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舞台上,他联合几位乐手排练了一组轻音乐节目,受到各方面

好评。该团带着这个节目到全国各地巡演,黄源尹自弹吉他演唱的几首印尼民歌,将整个晚会推向高潮。他指挥训练的男、女声小合唱,也很受欢迎。至今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的领导和同志们回忆起那一次的巡演,仍一致认为是该团演出的“黄金时节”。

同年,黄源尹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之邀,远赴北疆参加“哈尔滨之夏”的演出活动,他和女高音歌唱家仲伟联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黄源尹又开始受到人们的注目。次年春,他应邀南下广州,举行了三场独唱音乐会,并为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每周之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时,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盛情邀请黄源尹,要他到广州工作,说南方的气候更适合他的发展。几乎就在同时,他收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借调信函,他知道这是落实萧华主任“欢迎他回部队工作”的指示,几经权衡比较,他选择了“回部队工作”。在解放军的最高艺术学府,他一边教学一边演出,他为回到自己的专业,有机会发挥艺术才华而庆幸,他感觉春天已经来临。

然而,这是一个迟到的春天,一个短暂的春天。1965年冬,“阶级斗争”的气氛愈加浓烈,“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即将开始,黄源尹又被迫回到他当“右派”时的流放地——西宁。

“文革”期间,黄源尹成为造反派斗就斗,想批就批的活靶子,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从不愿多谈自己的遭遇,而是寄希望于未来。他利用时间系统学习我国的传统声乐理论,撰写、整理演唱笔记,修改自己的教学心得。

黄源尹的洋洋10多万言的声乐笔记,完整地阐述了他对建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理论、实践和思考,是黄源尹从事声乐艺术30多年心血的结晶。1983年香港新音乐学会以《黄源尹论歌唱艺术》书名正式出版发行。遗憾的是,黄源尹自己没能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1972年8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黄源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51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小女儿黄越还不到一岁。

黄源尹为了祖国的声乐事业奋斗毕生,可惜遇上了那个不能选择的年代,他出众的艺术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徒有一腔报国热血,奈何壮志难酬。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邓子恢巧释“空城计”

## ● 棲梧老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华中地区的新四军立即向徐州附近的日、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立即向新四军缴械投降。但是蒋介石抢先了一步,委任驻徐州的伪淮海省长兼保安司令郝鹏举为六路军总司令,所部编成四个师,两万余人,阻止新四军接收失地。

郝鹏举原为国民党军杂牌部队,历来受蒋介石嫡系排挤。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降日寇。此次虽被蒋介石收编,但心怀鬼胎,知道是不会被蒋家信任的。

郝鹏举也是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策反对象。时任中共淮北三地委敌工部长的廖卓之,和淮北区政治部敌工部长吴宪研究了一个策反方案,一齐向时任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的邓子恢汇报请示。

邓子恢听完汇报后,忽然问廖:“卓之同志,你读过《三国》吗?”

“过去看过。”

“那么你应该知道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喽。”

“知道。”

“你知道司马懿为什么退兵?”

“当然是害怕诸葛亮在城里有埋伏。”

“不对。”邓子恢说,“司马懿明知西城是座空城才退兵的。”

在座的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邓子恢接着说:“我们看过京剧《空城计》,诸葛亮身披鹤氅,焚香操琴,左边的童子,手捧宝剑,右边的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几个老军,低头洒扫,旁若无人。司马懿来到城下,仔细聆听诸葛亮的琴音,听了孔明弹的曲子,辨别了老半天,才决定大军后退40里。

“是因为诸葛亮沉着镇定,琴音不乱,料到城内必有伏兵吗?不是。

“是因为司马懿听了诸葛亮弹的曲子《十面埋伏》。

这个曲子是讲韩信包围项羽于垓下的故事。当项羽强大的时候,刘邦重用韩信;当韩信灭了项羽之后,刘邦就把韩信杀了。真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特别是诸葛亮唱道,‘这厢里只有琴童人两个,既没有埋伏又没有兵,只是缺少个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引起了司马懿的深思,诸葛亮显然是要他考虑考虑从琴音中所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考虑考虑韩信的下场。这样,就使他自然地联想起自己在曹营的处境。司马懿深感自己的处境跟韩信差不多,曹睿重用他是迫不得已的,是在诸葛亮收降姜维、骂死王朗、连拔三城、曹军大败、长安岌岌可危之际,才起用他司马懿的。曹睿对他根本就不信任。在这以前,司马懿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现在他又掌了军,如果现在捉了诸葛亮,自己的地位也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决心放过诸葛亮,借重与西蜀对峙的局面,打一场持久战来保护自己。”

在座的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新鲜,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与策动郝鹏举起义有什么关系。

邓子恢接着严肃地说:“诸葛亮设空城计的高明之处,不在军事上的疑兵之计,而在政治上他对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了如指掌,分析得精辟入微,充分利用了敌人的矛盾。”接着又说,“郝鹏举不是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收编他,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你们这次去,就是要认真分析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学习诸葛亮善于攻心、善于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做法,使自己处于更主动的地位。”

正是邓子恢的一席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增强了完成策反任务的信心。果然,经过艰苦的工作,郝鹏举率部起义了。

在自卫战争开始,蒋介石重兵压境之后,郝鹏举又叛变了。这并不奇怪,郝鹏举乃反复小人,是他的本性决定的。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 孙闻浪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乃至制裁。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十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有之策。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则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发现:偌大一个大清国,上上下下竟无一人能胜此重任,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蒲安臣生于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60年,蒲安臣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结果丢了自己的议员席位。为感谢助选之功,林肯于当选为总统的第二年,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匈牙利革命

领袖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不受欢迎。于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人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协商合作,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他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他向奕訢辞行时表示,今后(中国)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1867年11月27日,奕訢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

蒲安臣深知此行难度之大。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定在他最有把握的美国。蒲安臣使团抵达了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赞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在致词时也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1868年6月2日,

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纽约,蒲安臣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宣称:“中国愿与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让他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巅和溪谷。”

蒲安臣发表这些演说,根本就没得到过清政府的授权。这些演说令清政府目瞪口呆,立即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国使团遍游美利坚。到7月下旬才回到华盛顿,由蒲安臣与西华德在密室中商谈《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刚、孙家谷等中国官员则乐于将此重任推给蒲安臣,自己忙于各种交际应酬。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将此条约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12月26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克拉兰敦也宣布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当在英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英国)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

于三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到达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上都惟英国马首是瞻。况且当时普鲁士大兵压境,普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多纠缠。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立场一致。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1869年9月21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丹麦、荷兰和德意志联邦等国。由于这些国家并无修约交涉的任务,代表团过得十分轻松。

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2月16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此时的蒲安臣心情惆怅万分,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于会见次日病倒,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发展,惟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不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减。”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根据志刚的叙述,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颇为卖力:“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等在蒲安臣病逝后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蒲安臣虽是个美国人,但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中英西藏战争百年祭

● 彭 苏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支英国远征军击败了印度莫卧儿王国副王率领的印度军队后，最终控制了印度次大陆。

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1814年，英国殖民者趁廓尔喀和哲孟雄两国纷争之机，出兵帮助哲孟雄，廓尔喀奋起反击，将英印军队驱出国境。次年，英印军队再次大举进攻，廓尔喀向宗主国清王朝求救，清驻藏大臣不但不出兵相救，反而斥责廓尔喀。面对侵略者的大军，廓尔喀当局走投无路，只好向英国殖民者求和。

1840年，英帝国主义趁满清王朝日益衰落之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加快了对西藏的吞并行动。

1888年，英印卵翼下的哲孟雄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西藏军队进入哲孟雄。英印殖民当局以此为由，派出了一支用现代化枪炮武装起来的军队侵入哲孟雄。清政府软弱无能，不但不斥责英印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反而要求西藏军队撤出哲孟雄。西藏地方政府在清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决定抗击英军。清政府下令将文硕撤职。但西藏地方政府仍不顾清政府反对，与英军展开了激战。但由于武器装备过于落后，藏军遭到失败。西藏地方政府紧急从全藏调集了上万军队和民兵，赶到前线。当藏军路过拉萨时，年仅12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为每一位战士摸头祝福，同时，还在布达拉宫召集喇嘛念经，诅咒英军失败。这年6月，3000名藏军向英军反攻，再次遭到失败。10月，万余藏军再次向英军反攻，手持大刀、长矛的藏军遭到英军开花大炮的猛轰，死伤惨重，被迫退回西藏，得胜后的英军囚禁了哲孟雄国王，并攻入西藏，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降约，自此割占了哲孟雄，用刺刀、大炮打开了西

藏大门。

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陷于失败，西藏门户洞开。

公元1903年12月12日，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哲孟雄与西藏交界处，一支由4门大炮和马克沁机枪武装起的1000多名英印侵略大军，在1万名后勤人员的支持下，悍然越过边界，翻越喜马拉雅山，侵入了中国西藏。

率领这支侵略军的是臭名昭著的英印“西藏问题专家”荣赫鹏和英印军司令麦克唐纳准将。英印侵略军越境后，首先占领了西藏边境重镇亚东。6天后，侵略军又占领了空无一人的西藏南部重镇——帕里宗（县）。

英印侵略军大举入藏的消息，立即震动了全西藏和清王朝。腐朽的清政府命令清驻藏大臣有泰，要有泰“请求”英印侵略军返回亚东，然后派员与英方谈判。英印侵略军对清政府的要求置之不理，荣赫鹏和麦克唐纳继续率军向西藏腹地挺进。

与清政府的态度相反，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却立即在前后藏广发文告，动员全藏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西藏军民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下纷纷从全藏各地向西藏南部集结。

1904年3月，藏军拉萨代本（营长）来丁率藏军1500多人赶到了离吐纳10里的古鲁。3月31日，英印侵略军向前进攻，与藏军发生冲突。双方展开激战，英印侵略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藏军疯狂扫射，仅有大刀、长矛和少量火绳枪的藏军根本无还手之力，四下散逃的藏军士兵又遭到英印侵略军大炮的轰击，仅仅4分钟时间，800名藏军就倒在血泊中，拉萨代本来丁也壮烈殉国。

英印侵略军得胜后,继续朝 100 多公里外的西藏古重镇江孜前进。当英印侵略军行至地形险要、距江孜仅 30 多公里的日雪喀峡谷时,又遭到 1000 多藏军的堵击。勇敢的藏军凭险设伏,英印侵略军从两侧迂回,与藏军展开激战,英印侵略军凭借优良武器,仅以微小代价就击败藏军,攻占了日雪喀峡谷,打开了通向江孜的通道。

4 月 11 日,英印侵略军攻占了江孜古城。此时的江孜,军民已撤一空,英印侵略军得到一座空城。

江孜的陷落,立即震动了全藏。

由于形势的危急,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再一次紧急动员全藏军民奔赴战场。一时间,藏军和民兵一批批地从前藏、后藏各地赶赴江孜前线。江孜的失陷,不但没有使西藏军民气馁,反而激起军民的斗志。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西藏军民再一次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

4 月底,驻守江孜的英印侵略军的侦察兵,在距江孜 70 多公里的卡罗山口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藏军。英印侵略军为求主动,决定先发制人。5 月底,荣赫鹏派出了江孜驻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前往卡罗山口。藏军在山口前精心设下滚石阵,当英印侵略军先头部队来到这儿时,求胜心切的藏军过早地推下流石,隆隆的滚石从天而降,英印侵略军先头部队大吃一惊,全军急退,方躲过了这一次打击。当英印侵略军主力抵达后,发现集结在山口的是一支人数约有 3000 人的藏军。英印侵略军见山口耸入云天,地势十分险要,正面强攻极难奏效,于是便派出两支部队从两侧山上迂回到山口的藏军阵地。迂回部队出发后,英印军先从正面发起进攻,藏军顽强抵抗,准确的火力打得英印侵略军抬不起头。与古鲁和日雪喀两战所遇到的藏军相比,这儿的藏军的战斗力令英印侵略军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支从后藏赶来的、以骁勇而闻名全藏的康巴民兵。正面进攻失败后,迂回的英印侵略军抵达了藏军阵地两侧,英印侵略军先用开花大炮猛轰藏军阵地,然后三路齐进,藏军在顽强抵抗后终因力量过于悬殊,卡罗山口又落入英印侵略军手中。

英印侵略军万没有想到的是,藏军一方面在卡罗山口与英印侵略军激战,一边却派军队抄了江孜英印侵略军的大本营。

就在英印侵略军在卡罗山口与藏军激战时,一支 800 人的藏军于 5 月 5 日凌晨进占了空无一人的江孜古城。与此同时,另一支 800 人的藏军利用夜色掩护,向留守昌洛的英印军发起夜袭。藏军在接近英印军营房时被英哨兵发现,荣赫鹏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慌忙命令英印军抵抗。双方夜战至天明。

此时,在卡罗山口的英印军这才发现是上了藏军的大当,于是仓惶从卡罗山口返回江孜。五六千藏军把昌洛围得水泄不通,藏军还专门从拉萨运来了 20 门土炮和铜炮安放在江孜古城堡上,成天向英印军开枪发炮,给英印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仅仅两个月时间,英印军死伤达四分之一。随着藏军及民兵源源不断地从拉萨、日喀则赶来,英印军处境日益危急。

6 月 5 日,荣赫鹏亲率 40 名精锐骑兵从昌洛冲出藏军包围圈,返回后方搬运救兵。

此时,英帝国印度总督、荣赫鹏的保护人寇松勋爵结束了在印度的五年任期,返回了英国。在 6 月初的英内阁会议上,他阐述了英远征军战况和西藏的局势,迫使英内阁同意英印军在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失败后,向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藏传佛教的千年圣地拉萨进军。荣赫鹏得知英内阁决定后欣喜若狂。他和麦克唐纳率 2000 多名军队和 2000 多名后勤人员,浩浩荡荡直奔江孜。虽然藏军沿途对英印军援军进行了阻击,但由于英印军援军过于强大,收效不大。6 月 24 日,英印军援军在击退了江孜藏军的最后一次阻击后进入了昌洛,被围的英印军这才得到解救。

在长 16 公里、宽 10 公里的江孜小平原上,江孜古城堡无疑是最高大、雄伟的建筑物了。古城堡建在高出平原约 100 米的小石山上,十分陡峭。英印侵略军估计古城堡中至少有 5000 多名藏军守卫。中午时分,6 个连的英印侵略军在麦克唐纳的指挥下,向古城堡西北角的藏军阵地发起进攻。英印侵略军进至藏军阵地前 500 米时,藏军从阵地上向英印侵略军猛烈开火,古城堡内的藏军也从城堡上向英印侵略军开枪发炮,支援友军还击。在整个下午的进攻中,英印侵略军只攻到藏军阵地前 200 米时就再也无法前进。黄昏来临,英印侵略军被迫撤回。

麦克唐纳对眼前这种局势显然没有多大的办法,但英印侵略军中一些下级军官提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集中重炮,在厚厚的城墙上炸出一个缺口,然后强行爬上城墙,攻入城堡中。

英印侵略军炮兵中最大的10磅大炮将炮口对准了城堡东南角的城墙猛轰,不一会儿,城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且在炮击下不断扩大。长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爬山如飞的尼泊尔籍英印士兵开始向城堡上爬,藏军拼命地从城堡上向英印侵略军射击,甚至用石头向下猛砸,但英印侵略军仍不顾伤亡往上爬,并且一个一个进入到城堡中。英勇的藏军与进入城堡中的英印侵略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拚杀,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战至后来,随着进入城堡中的英印士兵越来越多,藏军见大势已去,只得四散奔逃。不少藏军从城堡上抛下长长的绳索,在英印侵略军还未进攻的城墙处缒下高高的城墙。江孜古城堡经过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后,终于落入了英印侵略军之手。

江孜血战后,藏军在这一线已不能再组织有效的抵抗,7月14日,英印侵略军乘胜向200多公里外的拉萨进军。7月17日,当英印侵略军进至卡罗拉山口时,又遭到上千藏军的堵击,英印侵略军击败藏军,部分藏军士兵在英印侵略军围攻下走投无路,竟跳下高高的悬崖,以身殉国。

8月3日,英印侵略军终于看到了金色的布达拉宫宫顶。

按照荣赫鹏的本意,是想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另成立一个在英国卵翼下的“保护国”。但他的这一主张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不是不想割裂西藏,而是担心军事上的可能性。荣赫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再有一个半月,西藏南部就要大雪封山,英印侵略军到时只能在拉萨过冬。而西藏军民,对英印殖民当局割裂西藏的反抗肯定会空前激烈,英印侵略军有可能会遭到军事上的危机,甚至覆灭的可能(英印侵略军已得知,拉萨三大寺的3万名喇嘛,准备在英印侵略军一旦血洗拉萨时,立即武装起来,与英印侵略军血战)。因此,英国政府指示荣赫鹏,在强迫中国当局签订对英有利的条约后退出西藏,日后再逐步征服西藏。

抵达拉萨后的第二天,英印侵略军耀武扬

威、全副武装地进入拉萨。这是西方军队第一次进入这座千年佛教圣城。英印侵略军示威后,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约定,由西藏地方政府供给其粮草,而英印侵略军则驻扎在城外。

双方开始了谈判。在这期间,英印侵略军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进入城中,而西藏军民对英印侵略军的仇恨,与驻藏大臣对英印侵略军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萨市民经常在街头群殴零星英军士兵。一名喇嘛还不顾一切冲入英军营地,企图刺杀英军司令麦克唐纳,在连续杀伤两名英军后被抓住,英印侵略军残酷地将他在拉萨市区绞死。

眼见隆冬一天天逼近,而西藏地方政府还在对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讨价还价,英印侵略军恼羞成怒,荣赫鹏向西藏地方政府下了最后通牒,驻藏大臣有泰也帮助英印侵略军打压西藏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屈服了。

西藏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天到来了。1904年9月7日,英印侵略军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内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签约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英印侵略军要有泰签章时,一名文案劝阻住了有泰。后来,清政府以此为由,于1906年在印度重新与英方签约,降低了这次战争对西藏的危害。1904年9月22日,英印侵略军开始从拉萨撤军,返回印度,临行前掳走了400多驼珍贵的西藏文物。

这次战争后的1911年,腐朽的清王朝覆灭。之后,虽然中华民国一直对西藏行使着宗主权,但由于英国亡藏之心不死,极力在西藏内部培育亲英势力,使国民党一直没能对西藏实行有效的控制。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1947年,亲英势力在拉萨发动了事变,将控制西藏大权、维护中国统一的热振活佛杀害,并将国民党驻藏人员驱逐出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竟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出代表团到联合国要求“独立”。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维护了中国的统一。1959年,西藏亲英势力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叛,十四世达赖和亲英分裂分子逃到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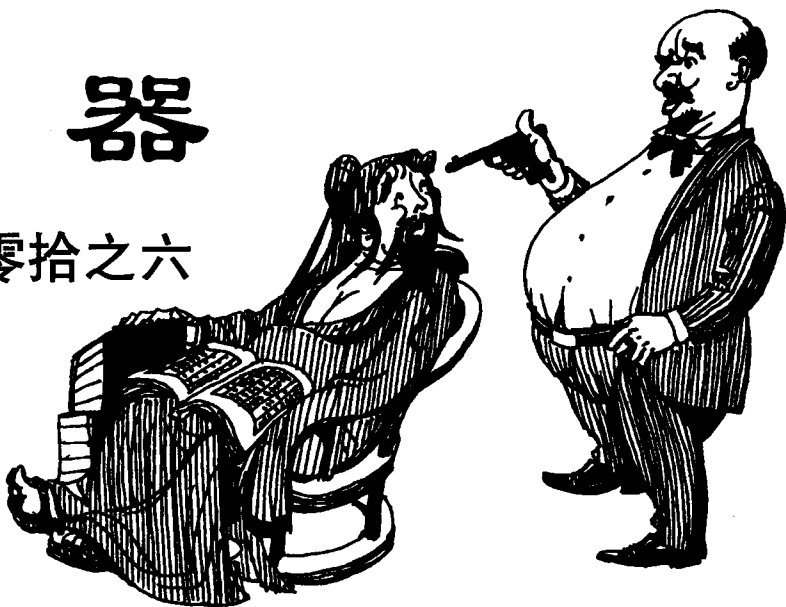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道 与 器

## ——精神现象零拾之六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中国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轻器，“下等人”则只管器而不太关心道。读书人都要去做人上人，把闻道看得无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传地做去。这情形，只要看中国论道之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寥寥可数，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农事的著作，可称的也只有《齐民要术》等有限的几部，不少还因不受重视而亡佚了。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已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了。

梁启超氏说，清代的学术，其研究方法已近于“科学的”。这是不错的。其对于已往以为神圣不可动摇之经书的怀疑精神，其于疑问的细密求证功夫，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有了证据还要反复查验，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于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细密研究功夫，还是都花到论道上面，孜孜于经书的真伪乃至一音一义的考证，弄到最后，与器仍旧没有什么关系。

洎乎近代，因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打了进来，这才觉得器不如人，但道还是我们自己的好。以中国之道，取西洋之器械，这就是“中体西用”了。重道轻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进步，

而道的争论却是很热闹的。主义呀、思想呀、理论呀，旗号满天飘舞。谁都想当圣人，谁都要弄一套主义，但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鼓吹之际，天花乱坠，一到实行，仍旧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实处上的少，所以中国还是中国。一场辛亥革命，说是什么主义的胜利，但照鲁迅的观察，不过革去了一条辫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换了一批主子——专制依旧，愚昧依旧，下等人的生活也依旧。

道是不妨论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个着落。这着落就是器。体制也罢，机构也罢，程序也罢，法律规章制度也罢，都是器。孔夫子讲：仁者“爱人”。孟夫子讲“仁政”，今人讲民主、讲法制、讲别的什么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极。但若没有一套确能保证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序、监督体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老先生说“我不欲仁”呢？事实上中国论孔孟之道两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终踪影全无。我们这个民族在论道上搞的花样、耗费的无谓精力实在已经太多，倒不如扎扎实实在器上多下点气力的好。诗曰：

要言妙道说千年，旗号新翻叹圣贤。  
最是千秋仁政梦，仍然似梦又如烟。

本期：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 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

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感谢多年来广大读者对本刊的关爱，欢迎继续订阅《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大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1996年至2002年合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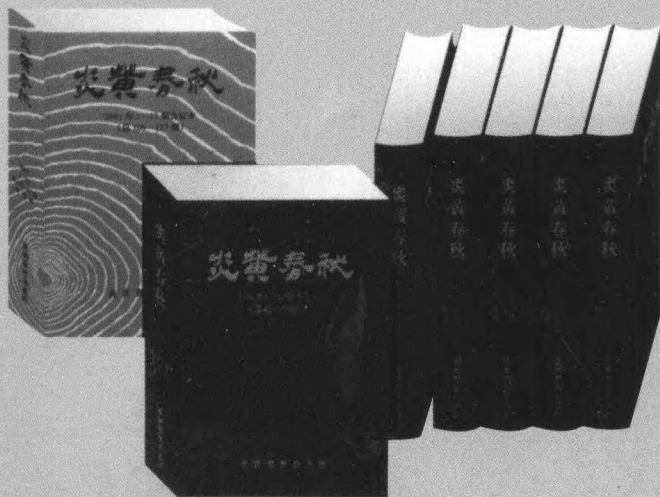
1996年	简装49元	精装52元
1997年	简装无	精装52元
1998年	简装无	精装56元
1999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0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1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2002年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以上均免费邮寄。(不含港澳台地区及国外)

发行部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 **隐蔽在阎锡山身边的中共党员赵宗复**
- **兴衰荣辱“黄埔系”**
- **殉职在抗日前线的诗人王礼锡**
- **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